

粤东大埔县百侯村的宗族、墟市、庙宇与空间建构

肖文评

(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传统村落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影响因素因之越来越清晰。但大量研究还是就民间历史文献讨论村落,而没有将其置于具体时间发展和空间建构中进行讨论,因而有零散之嫌,影响了研究的效果。本文选择粤东北部大埔县百侯村作为研究个案,试图将村落的宗族建构、墟市发展、庙宇、民间信仰活动等乡村社会标志性因素,置于具体的地方发展脉络和时空场景中进行讨论,探讨乡村的仪式活动与空间建构的关系。

一、百侯村的地理方位和环境

百侯村是位于粤东北大埔县东南部的一个聚落,距旧县城茶阳约 40 公里,新县城湖寮(1961 年迁)约 10 公里。以一个约 20 平方公里的盆地为中心,包括周围方圆约 8 公里的丘陵山地,发源于福建南靖县象湖山的韩江主要支流之一的梅潭河(原名清远河)从盆地中间穿流而过。原名白垠,相传因原在水口马山上的土堡、烟墩是用白色的石头所建而得名,1920 年代改为现名。

百侯位于韩江三大支流之一的清远河下游,清远河虽为小河,但其腹地处于闽粤交界地区,同时又处于山海之间,因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具体而言,百侯位于清远河下游的一个冲积盆地上,四面环山。东有郭山嶂,“盘围如城郭,故名。”南有南阳崇,“尊崇丰伟,岿然壮观,与郭山嶂对峙。”^①北有天保山,“其山崇峻,顶稍平阔。乡人筑土寨于上,以避寇乱。其东北有五岳山,状如莲花,亦称莲花山,崇峻壮丽。”西南有西山崇,西有马山,“其形头高如马,下有溪滩,名滑滩,船行颇险。”^②清远河从郭山嶂下进入百侯盆地,再由险峻的马山下滑滩流出至湖寮等地,至三河汇入韩江,约 50 里。百侯的山形水势,也因之在各乡村中号称全县之最。“乡之盛者莫如百侯,远则西岩万笏,秀若列眉,近则马山一峰,桀如注涧。”^③如果控制了马山,即控制了清远河地区。因此明嘉靖五年大埔建县之初所设之百侯隘,就建于马山顶上。

二、村落姓氏与宗族建构

1、村落姓氏

[收稿日期]2012-03-06

[作者简介]肖文评(1967—),男,江西泰和人,历史学博士,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 David Faure(科大卫)教授主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AoE/H-01/08):“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1,《地纪》,第24-25页。

②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輿志·山川》,第28-29页。

③ 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2,《山川志·形势》,第14页。

百侯盆地依地理方位分为侯东、侯南、侯北、侯西四片,现有居民1万余人,有杨、肖、丘、池四大姓和陈、林、李、钟等十多个小姓,实际真正的大姓为隔河而居的杨姓和肖姓。但在明清时期,村中姓氏相当复杂。

相传本地土著有钟、苏、白、雷等姓,唐代有曾姓等来此开基,宋代有江、蔡、钱等姓入村。现在村中主要姓氏,相传均于宋元之际从福建、江西等地迁来定居:

杨氏始祖四十一郎,相传于宋末从宁化石壁村迁来。“其先居于闽汀之宁化县石壁村。因宋末避乱,徙于粤潮之白垵,家焉。”^①现传至28世。

池氏始祖念三郎,相传于宋末从宁化石壁村迁来,现传至25世。

肖姓始祖念三郎为江西泰和人,相传宋末任潮州路总管,因避乱而定居百侯。现传至28世。

李姓始祖念八郎,于元初自福建上杭县官田迁居百侯溪南坪上开基。现传22世。

丘姓始祖念八郎(1343-1417),于洪武四年由闽汀上杭县迁居百侯。^②现传至24世。

至清初,村中大姓有肖、杨、池、林、陈、丘、李姓,被称为“正户”;还有许多小姓人家,其中登记在册、时称为“余户”的有鲍、刘、朱、阙、熊、钟、江、何、巫、卢、李、谢、危、邓、林、温、丘、陈、黄、周、黎、傅、吴、郭、曾、许、苏、张、连、罗、宋、梁等32姓。^③他们为大户人家的佃户,人丁稀少,居处分散。须承担地方差役,按户征派,难以承负。至康熙二十年杨士薰、肖翱材、池安国等士绅出面组织全村各姓“五分均当”差役后,尤其是肖其棠捐立“义田”后,状况才有所好转。

各小姓依附于大姓,生存艰难。他们或居于大姓村落周围,或租住大姓在山中的田寮,佃种大姓土地维持生计。但随着大姓人丁清初以来的较快增长,小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村边佃种的土地渐被收回,只好迁走他乡。如曹碓坑,原为杨氏下二房安敦堂人的田居,雇请佃户耕种,后因人多难以维持生计,就收回田居自己去耕种。^④

现侯南村有张屋、江屋、连屋、陈屋、刘屋、肖屋、曾屋等地名和屋基,表明张、江、连、陈、刘、肖、曾等姓人曾居于侯南。但现已无该姓人居住,而均为杨姓人居住。侯北原有钟、丘、李、卓、陈、林、曾、郭,号称“侯北八大姓”。但康熙年间大姓只有肖、陈、林、丘,现在只有肖、林、陈等数姓,可见变迁之速。

有些小姓则通过改姓的方式流传下来。相传侯东车头村原来除肖姓以外,还有雷、程、蕉、尹等小姓。当时附近多杨姓人,小姓常受大姓强房欺负,而当地大姓肖氏与杨姓经常相斗,因而各小姓站在肖姓一边,依附大姓,后来干脆改姓肖。至今当地还有一些传言,如“雷程蕉,改姓肖,气得祖宗霹雳飙”;“车头蕉,三十两银改姓肖,始祖改三世,气得祖宗霹雳飙。”^⑤

村中姓氏共居一区,关系复杂,既相互依存,相互通婚,又互相竞争。1949年以前,杨与肖、杨与李、肖与丘、肖与林之间曾发生过械斗,杨与李因而有“禁婚”现象。

全村现有居民10,357人^⑥,聚族而居。其中侯南、侯西杨姓5,000余人,侯南坪头丘姓300余人,侯南下村池姓200余人;侯北、侯东肖姓4,000余人。侯南还有李、钟、陈等姓,侯北还有林、陈等姓,侯东还有陈、李等姓,侯西还有曾、郭等姓,均在100人以下。四地以墟市为中心,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互相通婚,形成共同性的社区观念——百侯村,包括四个大的“角落”及其周边众多的小自然村。

① 杨绩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1页。

② 丘玉辉:《百侯丘氏族谱》,大埔百侯丘氏族谱编委会,2004,第60页。

③ 肖惠南:大埔百侯《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19页。

④ 2005年10月5日,在径南村对杨干标的访谈。杨干标居于安敦堂,70多岁,村委退休干部,2007年去世。其八世伯祖迁入曹碓坑耕田。

⑤ 2005年11月19日,在侯南村对杨添顺的访谈。杨添顺,侯南村人,70多岁,退休干部。

⑥ 中共百侯镇委办公室:《百侯镇二〇〇三年年终基本情况表》,2003年12月。

走进村落,祠堂、庙宇、民房、街市等,便一一呈现于眼前。整个村落硕大,房屋密集,基本连接成片。全村有明清古建筑数百栋,庙宇数十座,墟市店铺 100 余间。其中侯南自清中叶以来有“三十六条巷,巷巷都一样”的说法。当然,这是数百年来历史“层累”^①的结果。就空间布局而言,以盆地中央沿河两岸及墟市为中心,大姓居于中间,小姓居于大姓周边及盆地边缘的山脚下甚至山腰。就时间格局而言,从明末以来,有以盆地中央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趋势。

2、人口发展

百侯村现在近 2,000 户,上万人居住。纵观历史,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明代嘉靖五年建县之时,百侯已是当地有名的“大村”^②,约有上百户。在清初社会稳定后,百侯各姓人口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其中以杨姓和肖姓尤为突出。

据研究,杨氏宗族男丁在清初约数百人。^③到康熙三十三年,“丁男千余”^④。到康熙五十五年时,杨氏宗族“计丁二千有余”^⑤。至乾隆二十二年,杨氏有男丁 3,800 余人。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百侯杨氏,“溯肇迁以来迄于今,兹鼎经四移,年逾五百,世则二十有一,丁则七千有余,此皆就地而言。”^⑥仅男丁就达 7,000 余人。

除杨姓外,肖姓人口亦增长迅速。至乾隆七年时,肖氏丁口有数千人。“吾族自始祖传至今,计丁口以千计,田土数里。”^⑦乾隆十六年,即选教谕肖系良在所撰《修族谱序》中称:“我族自肇基祖迄今历朝四,阅世十有八,岁四百有余,丁三千有加。”^⑧肖氏人丁,与杨氏相差无几。

池氏至雍正十二年,人口发展至 600 余丁。至乾隆六年,居于百侯者有 100 余家,而迁居外地者很多。“百侯居处者,约百烟有奇。间或徙省城、移忠信、迁江西、下郡城者,不一而足。他若近地曲滩、帽山等处业耕者,又无论已。”^⑨

经大量外迁及多次水旱、鼠疫等灾难后,至民国年间,百侯村仍然是拥有上万人的一大聚落。据民国 19 年(1930)统计,“全甲人口男丁 8,306 人,女口 6,578 人,共 14,884 人,外出者 4,014 人。以姓氏分之,杨 8,553,肖 4,519,丘 1,049,林 189,李 185,池 177,罗 161,陈 72,苏 34,黄 49,刘 53,何 22,朱 17,庐 28,钟 12,张 12,温 15,赖 7,连 12,金 7,伊 5,管 5,郭 2,曹 2,危 5,曾 5,秦 5,熊 4,鲍 4,詹 3,邓、梁、吴、姜、郑、戴、余、蔡、王、汪各一人。”^⑩

可见,自清代中叶以来,百侯已成为一个上万人居住的大聚落。

3、宗族建构

清初以来百侯人口的较快增长,除迫使部分族人外迁外,还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族大人繁,支派繁多,关系复杂,争斗事件屡现,社会秩序混乱。百侯地方,一直有“相斗”的传统。康熙二十二年时,杨之徐把“乐斗”视为百侯的四大恶习之一。“好斗者,人之常情。义在为父兄者,有以制之。今则不然,子弟与人斗,父兄私自喜曰:‘吾子弟有勇力,可相助陵侮人也。’子弟欣然行之,罔知顾忌。卒也,恃子弟之强以斗人,竟反以自斗其父兄,良可哀已。”^⑪乡中进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重印本,第 52 页。

② 陈天资:《东里志》卷 1,《沿革纪》。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4,第 8 页。陈天资明正德年间生于饶平县宣化都上里(今大埕镇上东村)。嘉靖十四年(1535)登进士,钦选为户部给事中。后官至湖广左布政使,政绩卓著。嘉靖三十三年致仕归乡后,留心文献,采辑旧闻,搜罗遗逸,编成《东里志》。

③ 杨之徐:《先考南麓府君行述》杨之徐《编年录》上篇,1924,第 61 页。

④ 杨之徐:康熙三十三年《四世祖清隐公系尝序》,《编年录》上篇,1924,第 132 页。

⑤ 杨之徐:康熙五十五年《五男纘绪放洋告祖祝文》,《编年录》下篇,1924,第 49 页。

⑥ 杨光辅:《归善德化桥杨氏归宗序》,《归善德化桥杨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三月。

⑦ 肖凤翔:《百侯修谱序》(乾隆七年),肖惠南《肖氏族谱》,卷首,1935。

⑧ 肖系良:《(修谱)序》(乾隆十六年),肖惠南《肖氏族谱》,卷首,1935。

⑨ 池锡元:《修族谱序》(乾隆六年),池昭世《池氏族谱》,卷首,池昭世同治七年抄本。

⑩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 3,1943,第 21 页。

⑪ 杨之徐:《舟中言》,《编年录》上编,1924,第 33 页。

士杨之徐康熙三十七年从河南光山县令上退職归家时,所见之情景是“族党人浩繁,斗争相贼残”^①。族人互斗现象相当普遍,社会秩序混乱。

其次是严重的生活资源短缺。人口增长较快,而田土增加有限,尤其是在山多田少的大埔山区,导致生存资源非常紧张。对此,作为“一乡之望”的士绅们,深以为虑。如回乡后担任族长的杨之徐,不止一次地感叹:“邇来家口浩繁,贫病交功,日坐愁城。”^②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如何建立乡村社会秩序,处理好宗族发展与生存资源有限的矛盾,为族人建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有效地控制族人,促进地方社会的发展,成为士绅们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

康熙三十七年从河南光山知县任上去职家居的杨之徐,无法实现“治国”的愿望,便继承其父当族长的传统,以“齐家”为理想,在“读书课子”之余,以调理族事为己任。但族大人繁,使他倍感压力。如其子杨纘绪康熙六十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时,他喜不自禁,但寄给其子的信却说:“祖宗生我我生儿,门户担荷更仗谁;俗弊族繁贫日甚,义田乡校急维持。”^③希望儿子能够担当起革除俗弊、振兴门户的责任。所谓“义田乡校”,指的是为了建立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担任族长的杨之徐等乡村士绅利用国家鼓励建立宗族的政策,借助传统儒家宗族理论,以祭祀祖先尤其是开基祖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构,实现宗族制度化,从而使百侯村呈现出宗族发达、组织严密的社会形象。

(1) 建宗祠

百侯人建祠堂祭祀祖先,整合族人,建构宗族,始于明末,完备于康乾时期。

就现所见文献,百侯最早建祠堂的是肖氏。肖氏祠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但长期没有得到重视,至明末毁于战火。被尊为六世祖的肖恭是肖氏第一个取得功名的人,他率兄弟8人“修祖祠”,于溪北河边望楼下地方创立了肖氏第一座祠堂,但建后不久即毁于兵火。^④后来祖祠虽有所修葺,因仅容一神龛,族人祭祖只流于形式,草草了事而已,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直至万历年间,庠生肖端吉纠合族人,集资于原地重修。“迨万历己亥(二十七年,1599),十世孙端吉,倡率合族捐斂以重建之。端吉自捐银壹拾两,置簿合族分题,各捐有差。而祠宇乃复成,地名望楼下,当溪之岸,坐壬向丙。上下两堂,照墙、内庭深广相称,门向东。”^⑤

侯南杨氏建筑祠堂祭祀祖先,始于明崇祯八年,由杨世亨完成。《大埔县志》所载杨世亨的传记说:“杨世亨,明国学善仲子。弱冠采芹。事亲克孝。念上祖未有祠祀,倡族众捐贲,独任其劳,权子母,置尝田三百余亩。创建大小宗祠。”^⑥不过杨世亨所创建的,不是大小宗祠,只是小宗祠有庆堂,位于侯南下村铁炉坝,即杨氏开基祖四十一郎公定居的地方。

肖、杨等姓士绅建立祖庙,集合族人依时祭祀祖先,确立了官府提倡的儒家宗法伦理,建构起了宗族社会。但肖、杨宗祠建后不久,即遭明清鼎革之变,战火不断。百侯遭受到沉重打击,所建祠堂多毁于战火,祭祖活动无法进行。

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之际,士绅认为子孙都是由同一祖宗所传,而宗祠之建,可以聚合人心,因此建祠祭祀祖先相当重要,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之时。因此那些认同清政府并获得功名的士绅,便急急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己任,其首选措施是重建宗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建祠堂。清

① 杨凤来:《仪廷三兄赋送式光公车北上二十韵》,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第75-76页。

② 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第47页。

③ 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第129页。

④ 肖元傅:《大小宗祠堂记》,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85页。

⑤ 肖元傅:《大小宗祠堂记》,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85页。

⑥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9,《人物志·儒行》,第29页。

初肖翺材考中进士回乡后,即倡建宗祠,于顺治十六年建成小宗祠;杨士薰也于康熙六年重建了小宗祠。

杨氏四世祖的宗祠在杨士薰主导下,于康熙六年重建,并定期祭祀祖先,杨氏宗族得以重新确立。但随着族人日增,为统合全体族人,士绅们决定创建大宗祠。在进士杨之徐的主导下,康熙二十八年在侯南村中央六世祖达尊公坟侧建成大宗祠。“奉始二三世祖,崇祀大宗,以展两房孝思。”^①把大宗祠作为始、二、三世祖的专祠,定期组织族人进行祭祀,从而将杨氏两大房派统而合一。虽然大房“人稀力微”,但将全族统一于始祖之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通过建宗祠祭始祖,宗族内部的上下、尊卑观念得到巩固,宗族意识加强,宗族内部的团结得到强化。

而肖氏士绅统合族人的最突出表现是改建大小宗祠,建构成“鸳鸯祠”。康熙三十年,肖翺材之弟、族长肖翺材将小宗祠移建于望楼下大宗祠右侧。大宗祠、小宗祠并列在一起,乡人俗称“鸳鸯祠”。^②“我族小宗,乃四世祖乐耕公专祠,以康熙元年创建于本村乾上湖洋田。坐址卑下,春水涌溢,往日拜跪无所,不能成礼。康熙三十年,族人谋建于大宗侧。时大宗将圯,就地经营。两祠鼎建,以大宗居左,小宗居右,昭穆得宜,享祀不忒。”^③乡人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表达了大小宗祠之间昭穆有序的紧密关系。每当春秋祭期,子孙便齐集“鸳鸯祠”。“子若孙蝉联鱼雅,序列拜献,以共展水木之思者也。”^④达到统合族人的效果。

丘氏所建的第一座祠堂,是康熙五十二年由生员邱城东等人以四世祖诚直公为神主建起来的。至乾隆元年丘元遂考中进士后,创建始祖祠一原堂,以始祖的名义开展合族活动,把百侯、濂溪、长滩几个地方不同的支派统合为一。为保证合族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还创置了始祖祭产。

池氏始祖祠堂名为肇祯堂,相传建自宋代,后毁于兵火。实际正式建祠始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始祖念三公祠,前有仁斋公(池锡元)记,后有巧廷公(池渠)记,则知大宗自宋有之。元末明初,故址已被兵火烬毁。后聊筑一祠以祀之。至国朝康熙丁亥间(四十六年),修筑二堂三进。”^⑤乾隆十年重修。

李姓于乾隆十一年建大宗祠,与原来的小宗祠相配套,使祠堂制度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整合全族的态势。

各族在祠堂建立后,为了发挥统合族人的社会功能,每年春秋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为保证祭祀活动的进行,还特意制订了祭规。

宗祠作为宗族建构的象征和标志,各族以百侯开基祖作为始祖的名义建立大宗祠,标志着宗族建构的确立。

(2) 修族谱

为使族人清本源、明世系、分昭穆、定尊卑,康熙五十五年,贡生杨昆云编修了百侯杨氏第一部族谱《杨氏族谱》。族谱所载内容,有世次、科名、仕宦、志铭、传记、谏章等。至乾隆二十六年,由杨之徐第五子杨纘绪续修《杨氏族谱》。该谱除世系10卷外,还附有备考7卷,详载恩命、谱传、祠宇序、祀业序、祀业、节孝、艺文、题名录,记录了杨氏宗族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详细发展与运作情况。

《肖氏族谱》,万历二年始修,崇祯六年、雍正十年、乾隆十六年、民国24年先后续修。肖氏族

① 杨士薰:《小宗祠记》,乾隆《杨氏族谱》,《祠堂序备考》卷3,第4页。

② 2004年9月28日,在侯北村对肖清耀、肖延麟的访谈。肖清耀,70多岁,原村干部,肖氏宗亲会主要成员之一,笔者在侯北村的主要报告人。肖延麟,70多岁,原村干部,肖氏宗亲会主要成员之一,笔者在侯北村的主要报告人。

③ 肖氏四大房:《重建小宗祠碑记》(嘉庆二十二年)。碑存百侯肖氏大宗祠椒远堂。

④ 肖翺材:《更建大小宗祠题工费引》,肖惠南《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89-90页。

⑤ 池用我:道光十六年《肇祯堂因洪水冲毁复修记》,池昭世《遂畔居疏文禁文书信禁条对联序》卷1,第71页。同治四年抄本。

谱刻板印刷的只有乾隆年间所修之谱,内容分为八部分,“一世系,二谱传,三祠堂图记(附祭规),四坟山(附墓志),五祀田(附义田学田),六恩命,七献名,八文籍”,共12卷。至民国重修时,“原谱存仅一二,尚残缺不全”。因而依照旧例,重加修订,扩充为21卷,分为20册。^①因为经费困难,没有付印。

《池氏族谱》,由禀生池渠于乾隆六年创修,乾隆三十三年、五十八年先后续修。由于族产微薄,一直没有刻印分发各房各户,而只保留在历次主持修谱的长房手中。至同治七年,长房庠生池昭世为保留族谱,将旧有族谱重抄,共20卷,分为20册。

《丘氏族谱》,创修于乾隆三十三年,1930年丘焕枢重修。

各姓族谱的编修,用文字的形式确立了宗族建构的成果。使每一个宗族成员的身份和地位有谱可依,有据可查。

(3) 设族产

从明末到清初,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百侯各族尝产经历了一个由创立、沦失再到恢复和发展的过程。

百侯祖尝的创立,据所见文献,最早的是肖氏六世肖恭于明正德年间所立之尝,约200石。其次是杨氏八世杨淮于万历元年(1573)去世前在分拨子孙产业之后所自立的祀产。“直斋公之支分也,田屋悉作两房均坐。独蒸尝之立,五房轮流。”^②其数量有500多石。

清初肖翱材中进士前,肖氏的始、二、三世祖没有祖尝,祭祀祖先活动没有物质保障。为了凝聚族人,肖翱材便以修缮始祖坟墓的机会,倡议族人捐资购买祀田。于顺治十五年以凑份子的形式,创立了始、二、三始祖祖尝,建立起祖尝等公共产业,^③为制度化地祭祀祖先奠定了经济基础。

康熙年间随着人口增多,各族大量设置尝田。至乾隆年间,已发展至相当完备,而且相当丰厚。如侯南杨氏,杨清裔在乾隆二十六年所撰《裕后公祭田序》中有一概括:

吾族自始迁祖已下,代有祀田。春秋时享,及清明上冢,牺牲、酒醴之费,取给于斯。又以其余,助子姓办公项,奖科名,贍贫穷。多者一二百亩,少亦不下数十亩,惠至渥也。^④

在族人的努力下,始祖以下的历代祖先,都设有祀田。但各代祖尝数量不定,“大者六七百石,三四百石,下至六七十,三四十。”^⑤至乾隆二十六年,杨氏宗族及各房派所立尝产,据统计载于族谱者共计65份,每年收尝谷744,189斤。以全族人丁3,840丁计算,平均每丁达193.8斤,基本可以维持生存。^⑥

(4) 定族规

为使宗族管理制度化,各族先后制定了族规家法。康熙五十五年,杨之徐二兄杨鲲云编成《杨氏族谱》,杨之徐特赋诗一首,其中有言:“族谱繁能核,家规肃而良。”^⑦对于百侯杨氏所订完善的族规褒扬有加。对于族人违反族规之事,则严惩不殆。

雍乾年间,贡生肖俊章等召集族绅,经过讨论,订立肖氏《族规》,^⑧布告族人,要求严格执行。《族规》共计12条,分别为立宗子、户首办粮、理蒸尝、诚祭祀、戒斗殴、敬宗庙、称奖贤才、行周恤、谨称呼、谨归宁、谨出行、谨丧吊,明确了族人行为必须循礼守法的原则。

① 肖惠南:《肖氏椒远堂修谱说略》(1935),载肖学法《大埔县肖氏源流考》,大埔县肖氏源流考编纂委员会,1993,第19页。

② 杨之徐:《八世祖直斋公祭簿序》(康熙五十二年),《编年录》下编,1924,第15页。

③ 谢元瀛:《肇基祖墓志铭》,肖惠南《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03-104页。

④ 杨清裔:《仲裔大房五世裕后公祭田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10页。

⑤ 杨成梧:《九世坦素公尝簿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

⑥ 肖文评:《白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384页。

⑦ 杨成梧:《九世坦素公尝簿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

⑧ 肖惠南:大埔百侯《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2-185页。

如戒斗殴。“所以息词讼,亦所以保身家性命而全和好也。凡族间有事,必先鸣之尊长,次房长处。不听,然后鸣之宗长,以理直之。又不听,然后鸣之约保,自有是非公论。若未投明而遽相斗殴者,房、宗长拿到宗庙中重责。不服者,合族攻之,呈官治之。若夫以强欺弱,以诈欺愚,习刀笔,唆词讼,出入衙门挟持长官者,皆坏我祖宗忠厚家声者也,宜公呈于官,重治之,屏绝之,可也。”^①明确提出了遵循“礼”的原则,即规定族人有纠纷先找尊长,次房长、宗长,族中解决不了再找乡约、保长。如果不经裁决就相斗,将受严惩。

诚祭祀。“祭祀必斋戒,诚敬必躬亲。有衣巾者尤必慎焉。入庙思敬,过墓思哀,礼也,亦情也。乃有遇祭祀不到者,有到而不着衣巾者,其忘祖褻慢孰甚焉!犯者必有罚。”^②

敬宗庙。“宗庙乃俎豆之地,非干戈之场。岁时祭告,上有祖,下有父兄伯叔。先时宜斋戒,临期当洞洞属属,昭昭穆穆。或有怀夙恨而汇于此地者,不敬祖,不睦族,莫此为甚。犯者登即扭向祖前重责。不服,公罚其三年不得与祭。改则贷之。怙终不悔者,永不得与祭。”^③宗祠是祖宗灵魂之所在,是讲究礼法、明确上下尊卑秩序的地方,对祖宗必须尊敬,遇祭祀必须肃整到场,否则将受到严惩。明确了尊祖敬宗的原则。

谨称呼。“凡宗族相呼,昭穆不可混。如称伯叔、祖伯叔,以行不以名。兄弟相呼,则以字名加于兄弟之上。”^④明确了宗族内部的辈份和等级关系。

行周恤。“昔人助婚嫁,赙丧葬,不必亲旧,仁爱之心然也。凡族有贫苦者,用念一本之情,量行周恤之义,使婚姻有赖,死丧有资,推之先祖先公之心,未必无此意也。其他房有丁微而一线之脉者,尤宜亟助之。”^⑤明确了族人之间必须患难相恤的道理。

(5) 宗族发展与分房

清初以来,百侯村人口经历了一个较快增长的过程,全村人口超过千户,数万人。虽然人口众多,但居民聚族而居,每个人都依附于所在宗族房派,有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社会秩序井然。这主要是在长期宗族建构过程中,每个宗族都以开基祖为始祖,依照世序,确立房份,从属不同的祠堂中,建构起了严密的宗族网络,每个人都可以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享受不同的身份和待遇。

如丘氏始祖念三郎,传至四世,分为大宗、小宗两大房。传至五世,小宗分为三房。池氏始祖念三郎,“历二、三、四以迄五世祖毅直公,始分三房,孟房英彦公、仲房质恒公、季房森庵公。”^⑥后来孟房被称为大宗,仲、季二房被称为小宗两房。

为分析方便,下以杨氏宗族世系房派建构为例。百侯杨氏,自建构宗族以来,分为大宗、小宗两大支派。康熙六年杨士薰所建四世祖名为小宗祠,他在追溯至崇祯八年杨世亨首创祠堂时,亦名宗祠,表明大宗、小宗两大支派的观念在明末即已存在。

在当地人心目中,父生子,每一子对于父亲来说,在分家时就是一房。每个人的名字分为三部分,活着时有父辈所取的名字,有自己所取的字号,死后有由族人取的谥号。生前称呼名字,死后称呼谥号。^⑦杨氏三世敬宗生德广、德旺二子,四世分为大宗德广、小宗德旺两大支派。小宗四世德旺生华、宁、贵三子,他们死后依次被谥为裕后、克昌、吾叟,其子孙依次被分为裕后、克昌、吾叟三房。五世杨华生圭、玉二子,死后依次被谥为淳笃、沉笃,六世分淳笃、沉笃二房,因后代人丁较

① 肖惠南:大埔百侯《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3页。

② 肖惠南:大埔百侯《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3页。

③ 肖惠南:大埔百侯《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3页。

④ 肖惠南:大埔百侯《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4页。

⑤ 肖惠南:大埔百侯《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3-184页。

⑥ 池锡元:乾隆六年《修族谱序》。

⑦ 2004年5月8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杨永汉的访谈。杨禹功,80多岁,侯南村人,退休干部,百侯杨氏宗亲会负责人;杨永汉,70多岁,侯南村人,退休干部,百侯杨氏宗亲会负责人。

少,仍合称裕后公房。五世杨宁生安、瑾、宣三子,死后依次被谥为达尊、恣庵、尚德,其子孙被分为达尊、恣庵、尚德三房(俗称上三房);五世杨贵生淋、兴、清三子,死后依次被谥为耆正、简毅、纯励,其子孙被分为耆正、简毅、纯励三房;六世杨安传至九世杨万,生应卿、应儒、应试、应辰、应隆五子,死后依次被谥为简厚、达义、仰泉、谨厚、俊吾,其子孙被分为简厚、达义、仰泉、谨厚、俊吾五房(俗称下五房)。杨之徐在康熙五十三年所撰《八世祖直斋公祭簿序》中提到:“敦义公(即杨万)五子二十九孙,传曾孙百余……故今有五大房之称。”^①五大房的观念,本为本房内部的称呼,后因人丁发展众多,社会影响扩大,渐为其他房派乃至全宗族所接受。这一现象在康熙五十三年就已出现。

据报告人称,百侯杨氏宗族人口众多,宗支发达,传统以来有“八大房”之称,即俗称的上三房和下五房。^② 见诸记载的具体事例,如1924年3月旅外乡亲与族人议定的《原乡特设办事处维持公安》办法,就是由杨氏“八大房老成”商定的。^③ 存于侯南勉确公祠的尚德公房“勉确公祖业声明”^④,也是1929年正月由“八大房老成”署名。

不过查阅族谱,“八大房”并不是杨氏宗族的全部。如“八大房”,全部属小宗,并未包涵大宗;而“上三房”,仅为五世裕后、克昌、吾叟三房中的克昌公房之后。

宗族内部昭穆分明、秩序井然的世系房派,就这样以开基祖为始祖的名义,被建构起来了。即使人口众多,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墟市发展与乡村经济

百侯墟位于百侯村的中心,是全村侯南、侯北、侯东、侯西四个角落的中心地带,不仅是周边地区的商品贸易中心,也是全村经济活动的核心。因此对全村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一)百侯墟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百侯墟位于百侯盆地中央的梅潭河边,有店铺100多间,每逢农历三六九为墟期,向以经济繁荣、贸易活跃著称,号称大埔中南部地区的第一墟,有“小南京”之称。追溯历史,有一个发展过程。

1、百侯墟的发展

(1)百侯墟的出现

据记载,百侯墟出现于明末。在明嘉靖五年大埔建县之初,全县有墟市5个,其中清远河流域被官府认可的墟市仅有梅子潭市。至明末,大埔县墟市增至15个,其中清远河流域有梅子潭市、赤石岩市、中军营墟、百侯墟、枫朗墟4个。百侯墟“路通漳泉”,^⑤是由韩江流域通往福建漳州、泉州的主要通道和捷径。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当地人传说在500多年前的明代中叶,百侯就有墟市。在侯北下村的大坝、背头坪地方,沿河边曾是大街和市场,这是百侯最早的墟市,后来被大水冲毁。^⑥ 现在的百侯墟,相传最早位于侯南中村,至今当地仍有市窠坪等古地名,以前都曾作过墟场,后来才逐渐移至现在的清远河边。^⑦ 考诸文献,明万历四年(1576)春知县李汝极因公务路过百侯时,见到山民争着渡船过河赶集。“遇集期,则山间担炭薪、竹木、器物者,蜂拥至,故此渡舟易坏。”^⑧说明明末墟市已在侯南的清远河边了。

① 杨之徐:《八世祖直斋公祭簿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27-28页;《编年录》下编,第15页。

② 2006年9月8日,对杨禹功、杨永汉的访谈。

③ 杨自修等:《原乡特设办事处维持公安》,杨子源抄本,存杨兆和处。

④ 碑刻现存侯南村勉确公祠大门背后。

⑤ 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1,《地纪》,第37页。

⑥ 2005年9月28日,在侯北村对肖清耀、肖延麟的访谈。

⑦ 2005年6月20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

⑧ 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79-80页。

百侯及周边地区出产炭薪、竹木、器物等,而沿海出产盐、渔等海产品,相互之间有明显的互补性,商品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2) 墟市的发展

清初以来,百侯士绅对于墟市社会秩序的维护,颇为重视。如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因大火而重建百侯墟时,发生纠纷,进士杨之徐亲自出面进行调处,使重建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墟铺毁于火。豪强起兼并之思,混争铺地,几致蚁斗。府君(按:即杨之徐)出而力止之,亲行丈量,通乡帖然。”^①墟市因而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至康熙后期,墟市商铺达100余间,^②成为仅次于县城茶阳、三河坝市的第三大墟市,百侯墟市经济相当兴旺。

百侯墟虽建在杨姓地盘上,由杨姓人控制,但其经营活动并非完全由杨氏所垄断。侯北肖姓在墟市中经商致富者亦不少,如肖其宽、肖其案等人。肖氏对于联系两岸、勾通墟市的渡口、渡船的经营,多有捐助,体现了肖氏宗族与墟市的紧密联系。

(3) 以百侯为中心的墟市网络

至乾隆以来,地处粤、闽、赣之间的大埔人,因人口繁庶,人多地少,充分利用韩江及其支流的便利交通条件,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从外部获取资源以维护生存和发展,外出经商成为社会风气。“土田已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赞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穿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矣。”^③

本地商业贸易也因之得到长足发展。至乾隆初年,全县墟市增至20个。位于清远河畔的墟市,已构成了联系紧密的贸易网络。上游与平和交界地区的赤石岩市,“货船至此,起陆挑运。漳泉客货来者,在此雇船,有船长、夫长识认。”下游的梅子碇市,“在湖寮水口,有上碇市、下碇市。凡货船到市埠,用脚夫挑运过山五里许,雇船载。有原行船,亦必将货搬空,船乃得上下。其上、下二市,俱设埠长识认。”^④在上、下游的码头,设立了埠长、船长、夫长等相关组织,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客货运输组织。

位于上下游之间始设于明末的太平、百侯、枫朗三大墟市,经济相当繁荣。同仁的太平墟于康熙十三年改设新村近河地面后,“乡民围居,铺店稠密。每月逢一、四、七日为期。”枫朗墟位于清远河岸边的山坡上,“通饶平、平和。每月逢二、五、八日为期。”而百侯墟处于中心的地位,“在百侯甲溪南地,与枫朗、同仁相连,乡民辐辏,铺店鳞次。每月逢三、六、九日为期。”^⑤以百侯为中心,上游为枫朗墟,下游为太平墟,相距均为20里,为一天可以往返的路程。墟期互相弥补,除逢十外,构成一个完整的墟期时间表,为行商走贩提供了最完美的时间安排和经营机会。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地方社会的崛起,这一时期全县新增了5个墟市,其中3个分布在清远河流域,都在百侯墟的上游。南丰墟距百侯约15里,“在白寨甲之白罗村近临河岸,铺店十余间,设自乾隆四年,每月逢一、四、七日为期。”永丰墟距百侯墟约30里,“在兰片甲之大埠角村,近邻饶平,其墟原名泰安,康熙三十二年改名永丰。雍正元年毁于水,乾隆五年呈县批准复设,每月逢二、五、八日为期。”广安墟距百侯墟约30里,“在大产甲之大塘头村,通福建平和,铺店十余间。设自雍正九年,每月逢二、七日为期。”^⑥

值得注意的是,这3个新墟的墟期均避开百侯墟期,而与百侯墟期互补,明显具有相容性。而

① 杨又时等:《显考慎斋府君行述》,杨之徐:《编年录》下编,《附行述》,1924,第6页。

② 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3,《灾祥志》,第6页。

③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第8页。

④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輿志·社甲(墟市附)》,第52页。

⑤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輿志·社甲(墟市附)》,第53页。

⑥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輿志·社甲(墟市附)》,第53-54页。

枫朗墟与大埠角墟本来相距最近,但墟期却相同,明显具有竞争的色彩,反映其背后可能有较深刻的社会矛盾。

本县西北部濠洲都的墟市,如较场墟、大麻墟、长兴墟等,均为5天一墟期。而清远河流域则3天一墟,可谓交易频繁,贸易活跃,反映这一时期梅潭河流域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考察清远河流域墟市的分布和墟期的安排,发现至雍乾年间,清远河流域逐渐形成以百侯墟为中心的贸易网络。这一中心的形成,除了地理位置适中的因素外,还与当地人文的发展紧密相关:

人口的飞速发展。康乾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侯人口逐渐增加。杨、肖等姓在千丁以上,而全乡则在万人以上。侯北肖建邦康熙四十九年在说明添设渡口的理由时,明确指出了百侯人口的繁盛:“侯乡,一巨镇也。东水西流,遂分溪南北,为两社烟户丛居,以万计。”^①表明在康熙后期百侯居民即在万人以上,是清远河流域的“巨镇”。而百侯土地有限,本地所产远远满足不了消费所需,须从外地大量输入,从而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一时期周边地区得到充分开发,经济发展较快,产品大量输出。百侯墟市为这种互补性交易提供了交易平台,这是百侯墟市兴盛的基本因素。

文化的兴盛。自明末以来,百侯科举开始崛起,涌现了一大批文化精英,逐渐发展成为清远河流域的文化中心,对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感和吸引力。这批精英分子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建立了符合国家标准的乡村社会秩序。并整顿墟市,抑制豪强市霸,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详后),为墟市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宗族的重视。百侯墟位于侯南杨姓人的地盘上,正如湖寮的太平墟,因墟利所在,墟市的兴起往往成为强宗大族的争夺对象。杨氏因其明末清初政治、人口等实力的迅速崛起而成为社区的主导力量,同时亦成为墟市的控制力量。隔河相对的肖氏宗族,其实力虽可与杨氏相抗衡,但因良田众多,生计主要以农耕为主,加上两姓世代通婚,关系较好,因而两姓之间虽有争夺,但主要以和为主。杨氏宗族人多田少,许多人依靠墟市谋取维生之资,因而非常重视墟市,视之为命脉,故有“杨姓人吃街场”的说法。墟市虽曾多次遭洪水冲毁,但在杨氏宗族的支持下,以尝产作为投资来源,每次都能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如康熙四十年六月大水,“百侯溪南岸冲崩所有楼屋并基址,并俱变为溪。”但很快就重建起店铺100多间。^②雍正三年八月十五日,百侯“洪水为灾,墟铺尽塌,毁成平地。”^③墟店全被冲毁,亦很快就恢复正常。以强大的杨氏宗族为基础,保证了墟市的稳定和繁荣。

随着百侯墟市经济的繁荣,百侯逐渐成为清远河流域的经济中心,并得到周边地区的认同。如清末推行邮政,在湖寮而没有在百侯设邮局时,就有人在《岭东日报》上发表意见,名为《论大埔邮政宜推至百侯》,大谈举措之非,详细讨论了百侯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及其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

就清远一都言之,其近于大河者(即汀江和韩江,笔者注),则以高陂为都会。其属于清远河者,则以百侯为都会。百侯盖居清远之中枢,凡清远河流域之乡里,皆于此赴墟集焉。其东南,则一由白寨甲之白罗、南山,以至大产;一由兰砂甲之枫朗、双溪,以至白富,而接于平和。由兰砂之黄兰、沐教,越九峻岭,以接于饶平。其东北,则迂同仁甲之湖寮,(因维新甲为山岭所阻)过维新甲内,以至县城。其西北,则由湖寮至三河,以达于嘉应松口。人民之秀慧,贸易之繁盛,盖为清远河

① 肖建邦:《双合渡记》。肖惠南《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80-81页。

② 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3,《灾祥志》,第6页。

③ 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第188页。

之冠。^①

从中可知,百侯成为大埔东南部地区的腹地和中心,是该地区墟市经济的主要交易场所。虽然所论为清末,但实在雍乾年间就已形成这种局面了。

2、墟市管理制度

因墟利所在,墟市往往成为各宗族乃至强宗大房的争夺对象。士绅们以儒家伦理为指导,非常关注墟市的经营和管理。如在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百侯墟被大火烧毁后的重建过程中,一些强宗大房便依势争夺地盘,引起激烈冲突,乡中震动。进士杨之徐亲自出面进行调处,务求公允,得到乡人肯定。^②

至乾隆年间,杨之徐的孙子贡生杨必拔,出身于族中势力最大的“下二房”。自小“有志家政”,为此“不畏强御,不避亲仇”,在墟市上“整市规,毁标场。”^③对墟市管理,多有贡献。

乾隆时期,百侯墟市经济相当兴盛。虽然街市的盛况今天已难以明了,但在1984年冬百侯维修侯南街道时,从地下发现的一块乾隆十八年(1753)的《通乡公碑》,为我们提供了实证。该碑长119厘米,宽47厘米,碑文共445字,主要是乡绅对集市管理的有关规定,其内容全文如下:

法言云:“一哄之市,必立之平。”矧在万宝之聚乎!倘权量不划一,殊非盛世醇厚之风。兹通乡绅耆会议,公置铁字斗八个,铁字升八个,并编乾、坤、坎、艮、震、巽、离、兑字样。公置天平针秤五杆,编公、正、协、人、心字样。斗、秤俱付墟长收掌。斗、升用七留一,秤用三留二,依序轮换较对,永杜弊端。所有条约,详具于左:

一,米、谷、盐、食,随价低昂,俱用铁斗平量交易。如用私置斗升,予同受非,并罚油三斤,归本墟福德祠用。

一,杂货、咸鱼、猪、鸡及一切食物,用秤之处,总以对针为准。如不及针,则过在牙人及卖货者;如既对针,而仍额外多收,则过在买者;如牙人及卖货者,奉承势要,瞻循情面,而于对针外,暗送便宜,则予受同过。以上等弊,一经察出,并罚油三斤。

一,屠行除肠血外,一切花油、肚、脏,俱一上秤。无论时价高低,总以对针为准。其卖猪、买肉价钱,原有行情大势,听其照依时值买卖,无庸拘定。

一,瘟畜、母,不准屠宰。如敢混卖,察出,罚戏一本。

一,斗、升轮换,每墟期一次较对;针秤轮换,每月朔一次较对。

一,墟长工食,议定墟日,每斗一个给钱五文。早晨扛猪,每十斤卖猪人给钱一文。其开铺者,遇节日给钱十文,遇年给钱十文。

已上并经通乡绅耆公议,演戏通闻,勒石永遵。如犯弊款,鸣众公罚。倘敢抗顽,呈官究治。

大清乾隆十八年癸酉孟秋吉旦合乡公立^④

由碑文内容可知,此为墟市买卖和管理的条规,由全乡绅耆会议商定,以演戏的方式告知四乡,并刻石碑竖于街头。从墟市组织来看,墟市有墟长负责管理,各行有牙人介绍买卖,还有墟福德祠以求护佑。组织相当完备,可见墟市贸易相当活跃。

而碑文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度量衡的规定。以汉代杨雄所著《法言·学行》第一句“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作为依据,为了交易公正,议定墟市公置铁斗、铁升和天平针称,作为全墟贸易的标准度量衡。墟市中一切货物交易都必须经过公置称或升、斗来度量,禁止使用私称、私升、私斗;买、卖双方必须务求公允,不能依势,也不能“卖乖”,否则处罚。为保证度量衡的准确性,规定墟长必须

① 《岭东日报》,《论说》。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② 杨又时等:《显考慎斋府君行述》,杨之徐《编年录》下编,《附行述》,1924,第6页。

③ 杨元兴:《先岁进士茅庵府君墓表》,载《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第64页。

④ 杨国石:《百侯乾隆年间的〈通乡公碑〉》,《大埔文史》第7辑,1988,第74-75页。

定期对墟市上通行的公置斗、升和天平针称实行严格的轮换和校对制度。从竖于街头的碑文可知,百侯士绅确立了公平买卖、童叟无欺的交易准则,树立了诚信的社会形象,而从为墟市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田野调查得知,墟长一职,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街市的管理,一直由墟长负责。墟市有4个出入口,均设有栅门,早启晚闭,由墟长负责。但墟长不是墟霸,没有特权。墟长由墟市中有声望的大商家推荐,由各商家选定,没有任期,不能经商。其职责是掌握度量衡,清扫街道,晚上点、熄街灯等,负责市场管理,为商家提供服务。因无钱无势,又不能在街上做生意,因此并非人人愿做。^①

3、贸易繁荣与社会影响

(1) 墟市繁荣

百侯墟市店铺在康熙年间就有100余间,是仅次于县城茶阳和三河坝市的第三大墟市。墟市三天一墟,每当墟期,周边山区居民便蜂拥而至。“遇集期,则山间担炭薪、竹木、器物者,蜂拥至。”^②各地行商亦纷至沓来。货物以种类分行,墟市行类齐全。河边的柴行、竹行最大,牛行在黄沙坝,猪行在街尾,木炭行在木炭坪,鸡鸭等买卖在十字街,京果、渔盐、油米豆等在直街店铺。

据调查,传统以来,每当墟期,市场有三次高潮。第一次为早晨七八点,居于墟市附近的人上街购买新鲜蔬菜、肉等。第二次为十一二点钟,周边二三十里的山里人挑着山货来了,村人纷纷上街采买。至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山里人要回家,未卖完的东西只好贱卖,村人便纷纷上街“捡便宜”,从而出现第三次高潮。附近枫朗、湖寮等墟的墟市不过午,而百侯可以延至下午五六点,主要是赴百侯墟者人多,人群川流不息。^③

街上店铺,以杨姓人为主,多以祖宗公尝名义开办。其中以“下二房”人最多,100多间店号中占了七成。至1932年按统一规划改造老街时,二房主要有三麟公、慎斋公、通议公等公尝投资,私人投资兴建的较少。丘姓只有二间店,位于上街头。外地人在此租店做生意的不少,如丰顺、五华等地人,在街上租店开药铺。^④

墟市入口以大米、渔盐等为大宗,而出口则以竹木、柴炭、烟叶等山区产品为主。

(2) 社会影响

由于墟市经济的发展,导致百侯人传统农耕生计的变化。传统以来,当地流传的俗语称:“杨姓人吃街场,肖姓人吃田洋,池姓人吃鱼塘。”虽然所言各姓生计各不相同,但不论耕种,还是养鱼,还是经商,都以市场需求为中心,而杨姓控制着市场。可见墟市对当地人,尤其是对人多田少的杨姓,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墟市经济的兴盛与繁荣,对百侯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侯南人吃街场”的俗语,表明侯南人,尤其是控制墟市的杨姓人,多以墟市维持生计。这句俗语,反映了深刻的社会背景。百侯墟建在侯南杨姓人的地盘上,而侯南杨姓又人多地少,因而杨姓人只好充分利用墟市,或开店铺经商,或为商家服务,从事打杂、挑担等,从墟市中获取生活来源。

而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当地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及烟业加工贸易的繁荣。

(二) 乡村经济的发展

1、传统生计变迁

① 2004年9月25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杨禹功曾在百侯街经商多年,对墟市历史相当熟悉。

② 肖惠南:大埔百侯《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79-80页。

③ 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杨金章的访谈。杨金章,50多岁,曾为百侯供销社干部,在百侯街经商多年,对百侯街历史较了解。

④ 2003年8月11日,在侯南村对杨干标的访谈。

百侯山多田少,人口众多,迫使当地人充分利用墟市和市场,建立起外向性的多元化的经济模式。一是经商,利用墟市,直接吸取当地资源;或出外经商,获取外界资源。二是种植烟叶等经济作物,开发山林,积极发掘生存资源,扩大生存空间。三是发展文教,或任官,或任教于各地。

在康熙二十三年杨士薰为儿子分家的《父支分序》中,还反对经商,认为比较稳健的职业,还是读书和耕种。“诸男勿谓业薄,各能长守不失,则为祖宗根蒂之人。若听逛卖,谓可生放致大,则一去难得,罔有依归矣。人生在世,得意事少,失意事多。所宁者,或耕或读,循理畏法,积累以听其自致尔。”^①但至康熙五十七年杨之徐60岁为儿子分家时,其所撰之《诸男支分簿序》中,所提示的职业选择就扩展至工商了。“子孙士、农、工、商,务厥恒业,毋为游荡,比匪招祸,率之不慎,教也不先。”^②由耕读传家到士、农、工商并重,反映了士绅职业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变迁。

传统所言“侯南吃街场,侯北吃田洋”等俗语,表明百侯人已因地制宜,依据市场需求作出了自己职业的选择。

2、开发山林

大埔为山区,靠山吃山,以山养人,是山区经济的特色之一。至康熙以来,因为人口的增长,山区开发承载的份量愈来愈重。山田开垦众多,人工林种植相当普遍,由自然林至人工林的转变,成为山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埔地方,“多山陵林麓,耕稼之地,十仅一二。”^③多为山地丘陵,耕地仅1/10,所产粮食无法满足当地人需要。如康熙年间,一年之产不够半年之需。^④因而开垦山地,开发山林成为扩大土地面积、增加产量的重要途径。百侯虽为山间盆地,可耕地相对较多,但随着人口增加,土地亦越来越紧张,遂不断涌向四周山地,开垦新的田地。崇祯六年的举人杨廷纪,响应知县张燮任的号召,至崇祯八年与傅选、张一懋开垦出“田地山埔”20余亩。^⑤随着百侯人口的不断增多,后来杨姓到软桥、流湖畲、帽山,池姓到江屋冉,肖姓至将军畲、大水里等周边山区开垦。“山居小民,则烧山治畲,栽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勤苦倍甚。”^⑥经过村民的勤劳开拓,山区面貌大为改观。“山谷迢迢有水之处,自麓而跻腰颠,皆阪田鳞次,远望如梯级,如蹬道焉。其不可田者烧治为畲,以树旱禾、姜、豆、瓜、瓠、薯、芋,佐炊谷食。”^⑦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以提高经济效益。“种甘蔗、管蔗,煮汁炼糖。及烟草,以贩外省”。^⑧

发展林业。百侯人多地少,因此四周的山岭,亦被各姓充分利用,开垦山场,种植树木。如池姓祖尝山林,至乾隆年间建祠时,不足经费以出售树木以弥补。百侯车头的饭箩山,种满了松、杉等树木,“培植多年”,后“尽划而售之”,获利颇厚。^⑨百侯杨氏公尝山林不多,因而尤为重视。康熙六十年,杨之徐发现尝山之树林被盗砍,异常气愤,当即纠集村民集资,在山中建庙设立神位,以迎神会禁的方式,严禁村民盗砍。其所写《迎神会禁祝词》全文如下:

惟神聪明正直,厥道惟彰;百侯人士,久托慈航。祸淫福善,不替灾祥;有祈有报,戴显其光。念予侯里,人满土凉;耕耘无地,垦及山场。一杉一木,治生之方;凶顽无耻,刀斧是张。旦旦而伐,

① 杨之徐:《编年录》上编,1924,第42页。

② 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第83页。

③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风俗》,第7页。

④ 杨之徐:《禁烟公呈》,《编年录》下编,1924,第44页。

⑤ 张燮任:《广询利弊兴革事宜七款》,康熙《埔阳志》卷2,《政纪》,第93页。

⑥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风俗》,第7页。

⑦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风俗》,第23页。

⑧ 蔺塘: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第7页。

⑨ 佚名:《饭箩山记》,载肖惠南《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95页。

顿使山荒；弱肉强食，罔顾维桑。相凌以势，含怨谁控；不行会禁，滋蔓成殃。人谋允协，神力是勤；为恶者去，从善者昌。诛之殄之，扶弱锄强；幽求鬼责，明则人匡。革面革心，俗乃返良；爰鸠群姓，醪觥治觞。神威不远，鉴兹衷肠；降之百福，南北同康。^①

从祝文中可知，当时杨姓人已经在山中种满了树木，“一杉一木，治生之方”，把山林作为重要的生活来源。但村中人满为患，无田耕作，因此至山中开荒种垦，从而导致垦植与盗伐的矛盾。盗划山林不仅使山岭荒芜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会导致弱肉强食，引发激烈的社区矛盾和宗族冲突。为防患于未然，因此杨之徐纠集村民，利用乡人崇信神明的心理，迎神会禁，把山林的控制权交给神明。由此反映，人工林的种植和出卖，已成为山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侯村民依据山区地形多样化的特点，因地制宜种植多种作物，发展商品经济，促进了墟市经济的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

3、种植烟叶

对百侯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清初以来大量种植烟叶。烟草传入闽粤地区，始于明朝万历年间。由于它“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并有“杀虫兼润苗根”的功效，更由于种植烟草比粮食作物获利丰厚，“一亩之收，可致田十亩”，因而乡民竞相种烟取利。^②而在大埔百侯，种植烟叶的高利润，对于人多地少的百侯人特别具有吸引力。由于墟市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生产、生活各类商品的供应，许多原来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都改种烟叶，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养活更多的人口。至迟在康熙年间，已普遍种烟。

烟叶种植对土壤、气候等有较高的要求。土壤要求在半山半洋（平地）之间，排水性好；半沙半泥之间，透水性强；半湿半热之间，气候适宜。同时要求精耕细作，需用大量的人力、肥力。这些条件百侯都能满足。尤其是百侯人多地少，要以有限的土地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种植烟叶无疑是最佳选择。因而烟叶种植在百侯逐渐普及起来。

相传百侯家家户户都种烟，如八百丘、田心岗等一带良田，都种上了烟草。在长期的精耕细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烟叶为中心的作物轮作制度。“大宁、维新及同仁、百侯、石云等甲，早季多种烟叶，下季继以植芋，其收成为较丰。”^③在百侯实际上除了早季的烟和下季的芋外，还有一季水稻。烟草在春节过后栽种，间种芋头。五月收摘烟叶后，追加肥料培植芋头。芋头在七月收成后，再种水稻，至九月底十月初收割。如此实现了一年三收，既种粮又种烟，从而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收获更为丰盛。但主要收入是烟草，芋头则是特意培植的早芋头，产量也不低，既可当粮也可当菜。^④因此自康熙年间以来，百侯以盛产烟叶闻名于世。

嘉庆九年所编《大埔县志》，编者特意指出：“百侯、同仁一带，竟尚种烟，估客贩运江西发售。种烟之利，比稻加倍。”^⑤种烟能获“比稻加倍”的厚利，因而种烟在百侯一带已成为社会风气。在乾嘉时期，百侯等地成为粤东烟草种植的主要地区之一。

在种烟过程中，妇女往往比男子更善于经营。清末学者徐珂所编之《清稗类钞·风俗类》记大埔妇女说：“（大埔）盛行种菸，亦多由女子料理。种菸、晒菸等法，往往较男子为优。”^⑥

而且在村民的民俗活动中，亦多有反映。如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烟叶收摘之前的关键时候，种烟的村民便举行祈烟福活动，祈求神明保护所种之烟获得丰收。下以两份疏文为例：

① 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第124页。

② 方履钱：道光《永定县志》卷16，《风俗》。

③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0，《民生志》，1943，第5页。

④ 2005年9月10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的访谈。

⑤ 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3，《物产志》，第2页。

⑥ 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第322页。

《祈烟福疏文》:

伏以万物不齐,一草一木,均属造物之恩培。资生有托,惟大惟乔,恒赖神灵之庇护。信某等于本村各种烟树,以为岁计。朝斯夕斯,勤劳倍切于耕;或百或千,粪土更多于禾稼。值今清阳时令,目前固有芄灼之象;诚恐时光乍转,异日或有黄萎之虞。因思无感不通,仰冀神力以托命,有神斯格,爰集众信而预祈:当发起之日,则枝枝高干;遇收摘之时,则叶叶厚实。烟虫则沉埋不生,毋致生枝而叶落;烟瘟则远逐他方,毋令此生而彼危。庶几神灵之培植,免民之枉费,与农人同歌乐,岁而庆有年也。某等不胜感恩之至。谨奉疏以闻。

《种烟祈福疏》:

伏以三时不害,丰稔实赖神功;庶草咸蕃,长养均资帝德。某等以稼圃之余力,种烟草于中田,久托福庇,岁收蕃芜。兹值登畅荣之候,益赖呵护之灵。各醅肴以荐馨同,明禋以祈禳:惟愿雨阳应候,彼此均沾;成熟届期,繁叶尽茂。屏蠹贼兮远去,人羨蓁蓁;羌旱溢兮永免,亩维彧彧。及时是艾,丰不让于多余;善贾出售,利遍赐于三倍。某等无任感恩戴德,欢呼恳切之至。谨奉疏以闻。^①

从疏文中可知,村民以种烟作为谋生的主要收入,并花费了比种水稻多得多的劳力和肥料,因担心收成不好,故作福祈求神明消除烟虫、烟瘟等灾难,保证获得好收成,卖个好价钱。百侯人种烟普遍,每年祈烟福亦成为村民的主要民俗活动之一。

同时百侯人充分利用烟叶种植量大这一资源优势,发展烟叶加工和贩运业。不少人因此而发财致富,买田造屋,如杨梦广、梦奇、宗擢等,促进了百侯经济的繁荣。

4、烟叶加工和销售

随着烟叶的大量生产,加工烟叶的烟丝工场开始出现。其中较大的烟丝场有“益兴”、“捷足”、“贵和”等,由杨梦奇、杨宗擢等创办。将烟叶加工成烟丝有一系列工序,主要有撕烟、卷烟、刨烟等,而最关键的是刨烟。刨烟师傅多从汀江上游的产烟名地永定湖坑等地聘请,还有一些来自五华、兴宁及附近湖寮、大麻、恭州等乡村。本村没有刨烟师傅,因为刨烟须有专门技术,这些师傅不会传给本地人。本村人多在烟厂做撕烟、卷烟等没有技术含量的工序。^②

百侯所产烟叶不敷,主要从著名烟叶产地永定的岐岭、平和的九峰、韶关的南雄等地采购,雇人挑回。烟叶经加工成烟丝后,再按质量分等级,经过包装后加盖烟厂名号印记,销往外地。

为了扩大销路,一些烟商又至潮州等地开设商号,扩大经营。当时潮州的烟业,基本为大埔人所控制。百侯所产烟丝,不仅大量销往潮州,而且销往江西、广州等地,成为“潮烟”的主要生产基地。当时东江、湖南、江西等地人所抽水烟筒、旱烟筒的黄烟丝,很多就是百侯所产。潮州名产“潮烟”,顾名思义,出产于潮州。但潮州本地不产烟叶,所产多自韩江中上游地区。相传潮州人喜欢抽百侯所产之条丝烟,味淡,不象其他旱烟味道浓,火气重,因此百侯烟丝在潮州销路很好。^③

蔡洪生教授曾经指出,在清代国内市场上,有三种显誉大江南北的潮州货——潮州白糖、潮烟和潮蓝。潮烟即刘鄂在《老残游记》第五回所描述的“兰花潮烟”,是用泽兰子拌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用的皮烟丝。^④但所需原料烟叶的种植,据文献记载,清代潮州沿海只有潮阳一县,而粤东北的大埔、镇平、平远以及闽西南的永定、上杭等地则有较大面积的种植。潮阳所产烟叶,虽然条丝好,色乌味厚,但产量少,需从韩江上游地区大量买入,在潮州加工。因此黄挺认为,“‘潮烟’这种

① 杨茂轩:《家礼本》,“兰台书室上祖遗留”手抄本,第129-130页。

② 2003年8月11日,在侯南村对杨干标的访谈。

③ 2003年10月3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杨禹功的访谈。

④ 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韩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名牌货,实际上是闽粤赣经济区域内地域分工的成果。”^①这是符合事实的。但原料的大量购入,为外地商人控制这一行业提供了机会。据研究,潮州“乌烟”的生产和销售,以百侯人在潮州开设的“贵和”烟丝行最多和最为著名。^②而潮州“贵和”烟丝行,即杨宗擢在百侯所开“贵和”烟丝行的分号。

从乾隆以来,烟丝一直是百侯的主要输出产品。百侯墟“入口米为大宗,出口烟丝、柴炭为大宗。”^③至民国初年,“黄烟、水烟各项,以百侯出产最多,次为县城,出品少数。运销省城、上海、南洋,每年约值二十万元。”^④1934年广东民政厅所编印的《广东全省地方纪要》亦指出,“大埔农产,以百侯菸叶最为著名。”可见,百侯的烟叶,自康乾以来,一直是大埔乃至粤东地方的著名特产。

5、烟商杨梦奇、杨宗擢的个案

雍乾年间以来,百侯著名商人有杨梦奇、杨宗擢等。相传他们与当地民间信仰有密切关系。

在百侯商人中,最有名的是杨梦奇(1699-1787),村人尊称三麟公。相传他经营烟叶,开办烟丝批发行,发财经富,资产达百余万两银子。“公生平愿实业,后于潮州城竹木门内开张‘捷足’烟丝行,发达百余万金。七十多岁才建起高堂大厦文明毓秀诏许堂是也。”^⑤雍乾年间他至潮州开设“捷足”烟丝行,经营烟叶生意,获得丰厚利润。先后娶了几房妻子,盖起了诏许堂(即“文明毓秀”)、眷顾堂等大屋,成为可以与村中官宦相埒的人物。为提高社会地位,在乾隆五年42岁捐资“入监”时,还为11岁的儿子秩觉购得“监生”功名。乾隆二十五年,他又“例授明经”,购得贡生功名。^⑥

百侯墟市店铺原来分布零乱,不集中。相传在杨梦奇致富后,投入巨资改造百侯街,建了几十间店,将百侯墟店铺联成一体,从而形成了名符其实的街市。同时还为村民做了许多善事。相传他打造了许多石磨,租给乡人磨豆腐做豆干、米板等,每天的租金是一块豆干或板。为支持乡人经商,还提供资金。^⑦

在侯南村每年正月的祈福活动中,有一福场“平安福”,即设在他所建的诏许堂中,相传与杨梦广有关。传说杨梦广在乾隆四十年建好诏许堂后,眼睛却瞎了。就请青子凹龙安寺惭愧祖师“下童”,“童身”说是建房师傅在房子的中厅右片放了“小人仔”,并钉了钉子,因此使屋主眼睛瞎了。如要治好,须用六月天的雪水洗眼。后用六月下的冰雹水擦洗眼睛,果然好了。为表示感激,杨梦广送了50亩地给龙安寺作庙产,并在诏许堂中厅设祖师神位。从此以后,每年正月二十日,要请祖师爷来诏许堂中厅作春福,名为“平安福”。附近山下坪的中宪大夫第、赐福堂等屋的人,都来参加,相当热闹。^⑧

另一个大烟商杨宗擢(1686-1770),又名协强。他生活于一个大家庭中,其父有兄弟8人,自己有兄弟4人。在朋友的帮助下,经营烟业,发家致富,家资巨万。先后于村中盖起了三栋大房子——老楼子、百忍楼、德星堂。死后被族人取谥号“创裕”,以表彰他一生艰苦创业,创造富裕生活的经历。

关于其经商致富,民间有很多传说。相传他早年家中一贫如洗,无房居住,就住在祖屋“奕世隆居”的厅下。有一年年三十房众祭祖,把他的锅、碗、铺盖等全扔到屋外。协强很生气,就在年三十晚出门。走到庵下时被好友拦下,认为要出门也应过完年再走。年后朋友送他3两银子作本

① 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中国社会经济史》,1999年2期。

② 翁兆荣:《潮州烟丝业的历史始末》,载《潮州文史》第5辑,潮州市政协文史办,1985年。

③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10,《民生志》,1943,第36页。

④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10,《民生志》,1943,第30页。

⑤ 杨稿:《文明毓秀杨氏房谱》,1990年抄本。

⑥ 杨稿:《文明毓秀杨氏房谱》,1990年抄本。

⑦ 2004年5月3日,在侯南村对杨稿的访谈。杨稿,侯南村人,70多岁,退休干部,为杨梦奇的八世孙。

⑧ 2004年5月3日,在侯南诏许堂对杨梦广后裔杨稿的访谈。

钱,并建议他做香油生意,挑油到各神庙去卖。百侯附近神庙多,求神的多,因而生意不错。赚到钱有了资本后,收购百侯出产的烟叶,开设“贵和”烟丝行,加工烟丝,运销各地,获利丰厚,因而发家致富。^①他所建的德星堂,位于中村的李屋坪。而侯南村作春福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正月二十二日李屋坪的“太平福”。太平福与杨宗擢是否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雍乾以来,百侯人充分利用市场网络和经济区域分工,大力发展墟市经济和烟叶种植、加工和运销,不仅给百侯地方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为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百侯因之成为“大埔最繁荣名胜之乡”。^②

(三)墟伯公信仰

墟伯公庙位于墟头上下墩地方,为一小庙,供奉福德正神,因而又称福德祠。^③墟中商户认为,它是墟场的守护神,墟市的兴盛和繁荣,有赖于它的保佑,因此信奉者众多。每年的四时八节,每月的初一、十五,都有人来烧香。每年春秋两季的祈福和完福,二月伯公生日的庆祝,商户和村民都会组织活动,请礼生读祝文,举行隆重的仪式。仪式活动的祝文内容如下:

《商家祈福疏》

伏以贸迁要市,财源自此宏开;神功默相,利途乃以益大。某等各安生理,日就市缠,素蒙巨德降祥,更欲因时增福。届兹某季合荐频繁,伏愿神灵格享,永俾嘉祉,招东南之富贵,欢若云连;贮山海之奇珍,行如火速。愿交皆善类,奸人与诡人咸消;遇贩在远方,陆行与舟行均利。本盈子母,无难瞬息千金;源仅锱铢,亦定汇缠万贯。至雀角鼠牙之构,固望无虞;而波巨回禄之灾,尤祈勿作。再祈遍室无恙,皆曰吉而曰贞;随事亨通,俱无悔而无吝。谨告。^④

《墟市伯公宝诞祝文》:

恭维职司后土,五都之气运攸关;坛守缠居,一哄之财源永赖。萃坤元于市镇,贸易通衢;宰地点于中央,货财生殖。想神恩之有日,斯报德之难忘。兹仲春正逢宝诞,美华筵之大启,爵进三康;庆寿域之宏开,杏香千里。年年此日,喜开北海之樽;岁岁今朝,共祝南山之寿。伏愿广布桃觞之余味,德泽被于通墟;博施弧液之鸿庥,恩光及乎众信。寿高福厚,遥开八节财源;土旺龙兴,远引十方利路。动土膏而培生意,闾匱蒙庥;数中留而启财源,商旅戴德。堆金积玉,阖墟庆宝藏之兴;祝嘏称觞,千古仰含之泽。恩流一市,歌拜万年。尚享。^⑤

《商家冬季祈福疏》

伏以天地佑人,亘周于四季;明神福世,直贯于三冬。况惟尊神,尤永乾坤之至德,长施民物以深仁者也。某等以街市即良田,择商旅为恒产;知宏恩之弥渥,仰厚德于腊余。虽云一季贸迁,企倍长年贯利;探开金穴,拟黄叶之满林。游入银方,同清水之遍地;且雀角免其患,亦寇盗无其虞。事事休贞,庶曰成先而成后;家家迪吉,堪云善始而善终。谨疏以闻。^⑥

四、村落传统信仰与空间建构

(一)村落主要庙宇及其活动

1、村落主要庙宇

百侯村民建庙宇奉祀神明以求赐福的历史相当悠久。据调查和研究,现存供奉最早的是南宋

① 2004年5月4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杨禹功为杨宗擢的七世孙。

② 1903年四月初六,《岭东日报·潮嘉新闻》。

③ 1970年代墟市改造时被拆除。

④ 杨典祺:《家礼》第157课,民国年间抄本,第54页。

⑤ 杨典祺:《家礼》第207课,民国年间抄本,第77页。

⑥ 杨典祺:《家礼》第158课,民国年间抄本,第55页。

开禧元年(1205)开凿侯北蔡仙圳的蔡仙人。^① 其次是侯北石便上的篁竹宫,成化十八年(1483),当地丘、梁、陈、江、宋、郭、林等七姓人捐资施钟于宫庙。^②

但以合符官府的标准,明代嘉靖年间百侯登录于官方文献《大埔县志》“祀典”的有两座佛教寺庙。“端平寺,在百侯村溪北,今为乡约会所。万寿寺,在百侯村溪南。”^③后人考证,端平寺也在溪南。^④ 全县共9座寺观,百侯占了2座,说明当时百侯寺庙文化相当发达。至康熙、乾隆年间,县志所载录者仍为这两寺。^⑤

但于民间社会,普通百姓所祀奉的不合祀典的神明相当多而且杂,民间信仰相当发达。以官府的角度,其突出特点是“淫祀”。^⑥ 嘉庆《大埔县志》的编者认为:“埔民所祀,除合于祀典外,亦殊多不经者。然已庙食其土,或实能为民御灾捍患,未可知也。故并得而汇志焉。”^⑦在所纪录的各地宫庙中,百侯地区许多“不经者”冒了出来:五显庙、上洋宫、憩斯亭、篁竹宫、滑濂宫、文昌宫,等。^⑧

以上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侯南还有龙尾宫,祀平政公王;金汤围关帝庙,祀关帝;侯西水口公王庙,祀唐葛公王;侯西伯公庙,祀石伯公;侯北有梅树滩的妈祖宫,祀天后;林屋有关帝庙,祀关帝;侯东有城前角都衙庙,祀李都衙,等。对于这些庙宇的建筑时间,因缺乏纪年,村民一般都说不清楚,只是笼统地说从来就有。

通过民间的神明系统祈福求祥的观念,在乡村社会中影响很深。传统百侯人认为,一个地方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都要有神庙,不论佛道,以镇煞驱邪,居民才有安全感,因此百侯村的四周都建有宫庙。在这些宫庙中,认为属于道教的有村东的上洋宫(祀三山国王)、村中央的下洋宫(祀五显大帝)、村西水口的滑濂宫(祀三山国王)、村南的龙尾宫(祀平正公王)、村北的天后宫,其中前四者被称为百侯“四大宫”。认为属于佛教的有村中央的观音亭,村东廓山嶂下的宝林寺(祀惭愧祖师),村西的马山寺(祀观音),村南南阳崇的双林寺(祀惭愧祖师),村北天宝山下的宝华寺(祀惭愧祖师),后四者被称为百侯“四大寺”。每当全村作“太平福”举行迎神赛会时,要把各神庙里的神,尤其是“四大宫”和“四大寺”的神明迎请到场。^⑨ 当然,这种完备的神明系统的形成,有一个建构过程。

如村落东部水口的滑濂宫,始于康熙四十九年肖遁自、肖资幹捐资于此的设渡并建庙,原名“喜赐宫”,祀福德伯公。道光十三年被大水冲毁。重建后改名为明贶庙,祀三山国王。

2、集福

以上宫庙神明,均为村民在不同时期所建,并为不同群体的村民所信奉。每年四时八节,每月初一、十五,神明生日,都要侍奉。而每年最大最隆重的活动,则是春季的祈福与秋季的完福活动,村民俗称为“集福”。

每年春秋二季,侯南、侯北村都有隆重的集福活动。^⑩ 侯南村以南安寺惭愧祖师为主神,侯北村以肖氏大宗祠五显大帝为主神。

① 蔺 埏: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輿志·水利》,页67。

②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页12。

③ 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4,《宫室·寺观》,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页82。

④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页14。

⑤ 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3,《礼纪》,第32页;蔺埏:乾隆《大埔县志》卷12,《杂览志·庙寺》。

⑥ 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7,《礼乐志·民俗》,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页117。

⑦ 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7,《寺观志》,页1。

⑧ 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7,《寺观志》,页1。

⑨ 2005年11月22日,对杨德球的访谈。杨德球,侯南石屋下人,70多岁,农民,为现任下洋宫、马山寺以及正月太平福活动的主持人。

⑩ 1949年以后中断,1980年代恢复。

南安寺位于距百侯村约5公里的伍塘村青子凹,主神为唐代程乡县(今梅县)灵光寺的开山和尚潘为拳,死后被尊称为惭愧祖师。南安寺不知建于何时,所奉惭愧祖师相传为灵光寺分香而来。

每年正月十五至二十三日,侯南村要请惭愧祖师来祈福,俗称“祖师爷巡村”。相传祖师救了侯南杨姓,故杨姓人每年要请来侯南各地巡境压煞。因此祈福活动由杨姓人组织,丘、池等姓人不参与。在杨屋共设有8个点,从正月十五开始,沿固定路线,先后巡游刘湖畲、曹鲇、茶亭下、窑下、文明毓秀、上坑、李屋坪、楼下8个村落,并设福厂敬奉。每个村落都安排有固定时间,连头带尾共一天。牲醴供奉,仪式隆重。

每年在进行祈福活动时,都会在祖师神像前以跌圣筊的方式选出福首、执事若干名。福首为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执事则协助福首办事集福活动。由前任福首提名,经在神前跌“圣筊”确定下一届福首人选。每个人一生只能做一次福首,认为做了“很顺”,因此争做福首的事经常发生。

刘湖畲的福名为“永安福”。每年正月十五下午,“永安福”的福首要请人去伍塘村青子凹南安寺把祖师神像抬回来,锣鼓、旌旗先导,一路放铙,相当热闹。回村后,先到各家各户巡游,再到福厂坐坛,当地的三将公王、水口伯公以及各家各户的灶神等陪侍。晚上请戏班演戏。第二天上午进行祈福活动,有一整套的科仪仪式。

在集福完毕后,至下午1点左右,下一个巡游地点曹鲇村的福首会到福厂将祖师接走。此时双方打锣鼓,放鞭炮。

刘湖畲距侯南村约3公里,为何第一个作福?相传有一年祖师到枫朗黄兰村行香驱疫,回宫时在枫朗竭脚。当地一富翁见到后,就问祖师有什么本事?很瞧不起的样子。祖师听后就疯跑,一直跑到刘湖畲村才停下,当即“下马扶乩”。要杨姓人去枫朗赌“花会”,家里什么都可以拿去赌,就压“顺治”二字,保证会赢。果真这天富翁坐庄时,不管怎么变,就是出“顺治”二字,结果财产、田地甚至老婆子女全部输给了刘湖畲人。刘湖畲杨姓开基祖发财后,就把自己契给了祖师爷做儿子,并捐了50亩地给庙里。从此,祖师作福,第一站就到刘湖畲。^①

在整个巡游过程中,以正月二十二日在李屋坪的“太平福”最为隆重和热闹。李屋坪位于侯南下村的中心,人户最多,离城市又近,参与的人也最多,因而最热闹。^②

巡游的时间、福厂设置的地点都是固定的,每年依惯例进行,似乎从来如此。但实际上,巡游范围和设厂地点,有一个建构过程。其建构过程,与村落的扩展和村民的需要密切相关。

据报告人说,祖师巡游的范围,最早应是在侯南的中村和下村。后来随着村民的外迁,才不断扩大巡游范围的。如刘湖畲的“永安福”,始于乾隆年间杨济云从侯南村到当地开基并发家后。昭许堂的“平安福”,始于乾隆四十年。

楼下村的“永安福”,相传始于道光十三年。楼下村始建于清初的宁远楼,后又陆续建有三和楼、职思楼等,形成一个较大的聚落,设有三山国王、佛母娘娘、关帝圣君等神位。道光十三年(1833)百侯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楼下著名的3座大土楼宁远楼、职思楼、三和楼全部倒塌。大水过后,接着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村人杨学叔、启南发起集福,请祖师来驱煞,定名为“永安福”。从此,每年农历正月廿三接福,廿四日祈福。

楼下村永安福的福坛设在尚德公祠门坪。主神为青子坳惭愧祖师,全村所祀之神三和楼三山国王、宁远楼佛母娘娘、职思楼关帝圣君、茶亭下慈悲娘娘、观音亭观音大士、龙尾宫平正公主、下洋宫五显大帝以及各家各户的灶神等,都请来陪侍。

二十三日从李屋坪接到祖师后,被请到每家每户镇坛,由各户敬拜。第二天在福厂祈福。9点

① 2004年5月5日,在侯南村对杨稿的访谈。

② 2010年10月5日,在侯南村对杨兆和的访谈。杨兆和,侯南村人,70多岁,退休教师。

前各户自行烧香膜拜,9点钟开始行拜礼。福首、执事巡礼一次,各户将供品摆在桌上;问筊,烧香,敬酒三次。拜一次。拜第二次时读疏表,向众神祈祷。拜第三次后烧纸宝,然后放鞭炮。礼毕。期间锣鼓齐鸣,放铙。11点结束。^①

侯北村春季的祈福活动则在正月十五日晚。由福首等10余人抬着五显大帝神轿,在锣鼓等护送下,从大宗祠出发,巡游中村、下村、上村等肖姓各家各户,“驱邪压煞”,至次日凌晨才结束。

每到秋季,则百侯全村作大福,名为“太平福”,福坛地点在侯南村清远河边的黄塘坝。全村杨、肖、丘、池等,各姓均可参与。全村所有众神,包括龙安寺、“四大宫”、“四大寺”、水口公王宫、天后宫等神庙的神明,均要抬到福坛供信众叩拜。

光绪年间百侯各姓在大沙坝作太平福时,因福会很大,摆了100多台供品,请了戏班做大戏。各家各户绑柱子搭台看戏,有肖姓人要搭在杨氏人前面,杨姓人不肯,双方互不相让,进而发展为械斗。此后,侯南、侯北开始分开作太平福。侯南仍在黄塘坝,侯北则在太宗祠下河边的大沙坝。^②

侯南村太平福的时间为农历9月20-24日,侯北为9月25-29日。^③侯南太平福的主神为茶亭下观音、上洋宫三山国王、下洋宫五显大帝等。^④侯北太平福的主神为大宗祠的五显大帝,附祀的有上洋宫三山国王、龙尾宫平政公王、滑濂宫水口公王、竹宫三山国王、茶亭下观音、茶亭下石伯公、龙安寺惭愧祖师、南山杨林太公、椒远堂丰宫公王等数十尊。前后5天,仪式隆重。

南北双方互相竞争,相互对抗。如演戏,侯南演《肖太后割喉》,侯北则演《杨令公撞碑》。这边3天,那边也3天。^⑤

3、求雨

每当气候干旱,影响到农耕时,村中长老便要组织村民到神庙中求雨。如没有效果,就要抬神明到百侯四面的高山廓山嶂、南阳崇、天保山、西山崇的山顶上去求雨。一般抬的神明为观音。如1934年和1935年的干旱,“各家农户都要派人集成队伍,三步一拜,九步一叩(叩头)的拜到山顶上去求雨。”^⑥求雨的概况,可从时人所撰《侯乡登山激雨词》中略见一斑:

吁,嗟呼!白侯一甲,皆狼戾不仁耶?何自春及夏,时雨不施耶?绅耆士庶,洁诚叠祷,不闻不知耶?抑斋戒不齐,清浊混淆耶?岂作孽耶?致故不稼不穡耶?他乡求雨得雨,某等四山登临,求之不得,何耶?天心仁爱,独不恤此土此民耶?草木槁枯,川流将涸,目睹心惊,有如是也?农时已失,田园荒芜,百神享祀,将何出耶?国课供耶?饔餐将给,其将流离死徙耶?神其奉天行罚耶?不徇舆情,不悯人穷耶?其何百求不应,涕泣悲号,若等闲耶?既竭心思,既竭足力,红日炎炎,狂风阵阵,奈若何耶?其将穷饿绝粒,使之靡有孑遗耶?佛力其忍耶?其不忍耶?如其忍耶,付之天命。其不忍耶,奏之皇天。早降甘霖,以便栽种,以救残喘耶?有言难,无泪可挥。百拜上疏。^⑦

(二)村落水口的经营

1、马山寺的经营

百侯人第一次有意识地经营村落水口的是杨浈。杨浈为迁居潮州北门的杨凤的孙子,作为杨氏宗族第一个举人,多年在外为官后,重回祖乡,光宗耀祖,成为家乡威望最高者。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对原乡百侯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创寺阁于祖乡马佛山”,是指将村中央庵下的端

① 据楼下村杨永汉说,如今侯南已大部分改为前一天下午拜斋,第二天完福拜牲醴。但楼下依旧上下半年各一次。

② 2003年8月11日,在侯南村对杨干标的访谈。

③ 1949年后中断。1980年代侯北的太平福恢复后,作福地点改在鸳鸯祠堂门坪,时间改为了农历11月中旬。侯南秋季的太平福没有恢复。

④ 2004年9月25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

⑤ 2003年8月15日,在侯南村对杨冠钦的访谈。杨冠钦,侯南村人,60多岁,民营企业家。

⑥ 饮冰:《崩溃中的大埔农村》,《东方杂志》第33卷第4期,1936。

⑦ 杨典祺:《家礼》,第170课,民国年间抄本,第62页。

平寺移到村口的马山上,改名为马山寺。端平寺原在侯南庵下,建于宋朝。嘉靖十一年(1532)秋,百侯溪南缘首杨厚、张凤,捐“造大香炉一座,并带钟鼓,一应完成。”^①至明末,杨泂与村人将它移到了百侯村的水口之地马山上。康熙五十年(1711)贡生杨凤来所撰《江公祠祀略》云:“宋时有江廉夫妇原置地基一所,坐落侯南河唇边之中,因年老无嗣,将地建庵奉佛,额曰‘端平寺’。至今犹沿旧传称其地曰庵里。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0)武定知州杨泂、乡饮宾杨森、博士员池士滔,迁庵于河西马山之巔。”^②

而同治年间所修《县志》则称所移寺庙为村中的万寿寺。“马山寺,原在百侯溪南,名万寿寺。后里人杨泂移建于水口马山,遂名马山寺。”^③

不论所移是端平寺还是万寿寺,或两者兼之,将侯南村之庙移于全村水口“通乡公山”之上,由僧侣晨钟暮鼓于其中,当然具有镇守村口之义。同时在寺旁建造“八角楼,壮丽观美”^④,名为文昌阁,祀文昌帝君。“百侯文昌阁,在百侯社马佛山,邑人杨泂倡募鼎建,为一方关锁。”^⑤建文昌阁以振兴地方“文运”,这是杨泂在江浦县任职时的成功经验。因此在家乡村口修建文昌阁,既表达了杨泂对家乡社会的殷切期望,也表达了村人对读书考取科举功名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影响的渴求。至此,村口的马山寺和文昌阁,一直成为百侯村的标识性建筑,对于村中的人文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康熙二十五年《埔阳志》所称:“自此风气回,人文盛,浸浸乎登贤书者众矣。”^⑥

明末清初长时期的社会动荡,村人管守不力。至康熙年间,村口的文昌阁和马山寺,“以住守无人,日久颓塌。即寺亦污秽湮漫,几不可问矣。”^⑦所见已是一片颓败景象。随着康熙以来士绅阶层的崛起,士绅的公共意识不断加强。对水口风水的维护,成为他们的共识。康熙四十九年,杨凤来开始经营马佛山寺庙,得到了进士出身的弟弟杨之徐的大力支持。在其所撰写的募捐引言中,是这样认定修寺的重要性的:

马佛山位居西陲,水从东注,而是山屹然,为一乡水口之镇,诚吾百侯一大门户也。建寺其上,供奉如来,历有年所矣。因住守无人,颓落毁坏者数十余年。幸吾仪廷三兄慨然首事,募通乡财力重修,佛身庙貌,赫然一新。而辛卯(五十年,1711)文运丕振,南北三捷(南协吕、协泰,北肖俞聘),毋亦地灵神力之所焕发而呵护耶?!兹谋乡众,请涵一禅师卓锡其中,朝夕祀如来香灯,并守山场左右树木,俾之郁葱蔚荟,以壮巨观。而游人至此,扫除蓬径,拂拭松阴,诂不美哉!顾粮米未兴,檀越须人,眼下募题米油诸费,寥寥未足。吾乡人士,各发菩提愿,种祥莲果,多少随心,福祿如意。米饱僧厨,即是僧禅入定;油燃佛盏,常令佛室生光。侯村簇绣,咸生欢喜之心。马鬣浮青,忽现皈依之路。用摭片悃,敬弁数言。^⑧

在百侯士绅眼里,马佛山地势显要,又刚好位于村口,因此“为一乡水口之镇,诚吾百侯一大门户也”,成为出入百侯村的重要门户。但山上的马佛寺,由于明末以来长期无人看守而倒塌。康熙四十九年,杨凤来任首事,募集通乡财力进行重建。刚好第二年村中侯南、侯北有三人同时考中举人,这在百侯是第一次。士绅们有意借此大力宣传,认为这是在村落水口建寺得到风水保佑之结果,是风水灵验的表现。为经营好这一门户,不致重蹈无人看守而倒塌的故事,杨之徐兄弟趁机再

①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1943,第13页。

②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1943,第13页。

③ 张鸿恩:同治《大埔县志》卷7,《寺观》,第8页。

④ 杨之徐:《马山寺碑记》,《编年录》下编,1924,第110页。

⑤ 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3,《礼纪》,第32页。

⑥ 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49-50页。

⑦ 杨之徐:《马山寺碑记》,《编年录》下编,1924,第110页。

⑧ 杨之徐:《马佛寺募化小引》,《编年录》上编,1924,第309页。

次募资,聘请程乡县的涵一禅师师徒看守。

通过全乡人的贡献,并征得村人同意,基本募足了看守僧人的生活费用。杨之徐特意撰写了《马山寺碑记》,并刻碑竖于寺中:

清之康熙庚寅(四十九)年,吾三兄仪廷慨然念山寺为百侯水口之镇,乃募通乡财力重修之,佛身庙貌,焕然一新。又恐无人居守,终仍故事也。岁之壬辰(五十一年,1712),请涵一禅师同其徒郁莲、郁华,住持斯地。仍以修寺余贲,生放积累,并置寺田地为僧人养贍费。寺中有约亭江公夫妇神位,江公亦捐租八石入寺,以永香灯之祀。田业稀微,仅足贍二三僧人。守寺看山,长养近寺一带松木,俾之郁葱崇隆,作水口华干,乡运实与有赖焉。乡人曰:“是不可不勒之石,用垂久远也。”属余数言记之,余喟然叹曰:“物之废兴,诎不以人哉。后之君子,共相护持焉,山灵其亦拱揖以待。”

一,募题通乡买曲滩田种三斗八升,共额租十二石,带官民米九升二合。原系为曲滩造桥之费,因此坑口岸崩阔,桥不能造,今拨为本寺养僧祀佛口食。

一,募题通乡买置青坑尾楼子背三角塘一口,直至坑尾,额租三石,带官民米五合;又本村神宫背深塘一口,容种四斗,额租十石,带官民米五升五合,俱拨为本寺养僧祀佛口食。

一,江公约地与杨族对换出本村南洋过路丘,田种二斗,额租八石,带官民米五升,今拨为本寺祀佛,并祀江公神位香灯之需。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仲秋后一日里人杨之徐撰^①

在置买僧人生活所需的田产时,动用了“曲滩造桥之费”。所谓曲滩造桥之费,源自康熙四十年二月杨之徐发起的募建西山溪口和曲滩石桥活动。作为交通要道的溪口与曲滩,因堤岸崩塌,行人难以逾越,杨之徐等士绅倡募捐造桥造船。^②在杨之徐三兄贡生杨凤来的主持和董理下,募集到一笔钱。花了其中八十两银子于当年十月建成溪口石桥。所剩银余按原定计划,置买田地,筹作曲滩造桥或造船之需。这次则移作马山寺和尚守寺看山之用了。

同时,在百侯人眼里,马佛山不仅仅是村落的门户,更重要的是村落的水口风水。在传统“客家”人的观念中,水口相当重要,是把守全村财气,保佑村民富贵的。^③既然关系到全村的福祉,那就更显重要,而且易得到全村人的赞同和支持。为保护这一风水,杨之徐等绅衿还特意与村人立下规矩,写下《马佛山禁碑》,并将禁碑竖于山上,要看守佛寺的僧人严格执行。碑刻详文如下:

为公禁事。照得马佛山为百侯一乡水口之镇,最宜树木丛蔚,以壮巨观。向因住守无人,未行通禁。夫草木者,山之衣也。人有衣冠,则威仪瞻丽;山有草木,则气象峥嵘。况兹山水关锁,风水系乎一乡者哉!迩来请涵一师住守是寺,奉佛香灯,兼管山场左右松杉杂木,不许采樵之人乱行砍划,俾其茂盛成林,镇水口之门户。凡我乡人,各宜凜遵,共培大家风水,勿快一己便安。如有不遵故犯者,准僧人擒获杖驱。仍肆横强,立即指名通报绅衿。公罚演戏一台,无力者公杖四十。言出必行,毋貽后悔。其妇人恃泼强砍者,罪归夫男,例亦如之。再寺中未有钱粮,目下俱属募化,供给日食,或有往来游僧过客,幸相体谅,不得借言宿扰。本僧亦不得徇情私留,觉出定行驱逐,有失体面。特悬禁牌,布告中外。^④

由于在经营马佛山风水过程中,百侯人科举不断获得成功,因而认为是风水保佑的结果。并由此凡有关全村的风水,也渐为士绅所关注。

2、“禁凿水口”

① 杨之徐:《马山寺碑记》,《编年录》下编,1924,第110页。

② 杨之徐:《募建西山溪口石桥小引》,《编年录》上编,1924,第110页。

③ 刘大可:《传统的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第50页。

④ 杨之徐:《编年录》上编,1924,第311页。

流经百侯盆地的清远河,从东面的东山村进入,呈反“S”形横过盆地中央,再从西面马山脚下流出,可谓一曲三折。在入口处为大水碓头,“水中大石横亘,怒流湾急,声闻数里。”大水碓头下为长潭,“长一里余,静深莫测。”长潭下为大桌门,两岸岩石耸立,河窄水急,波涛汹涌。大桌门下为狮子潭。至马山下的百侯水口处有滑滩,“乱石交横岖崎,水涨益危,船上下人皆登岸行。”^①滑滩下有麻潭。百侯名为盆地,但地质结构相当复杂,地势颇不平坦,因而河道亦颇弯转。在入口处的大水碓头水中大石横亘,出口处的滑滩乱石交横岖崎,如遇洪水,则水流渲泻不畅,容易使水屯积,从而形成水灾。百侯地方因此被洪水淹没,损失惨重。

自明末清初以来,由于上游山区的开发和下游地区对山中商品的需求大增,清远河中货运繁忙,行船相当多。据康熙四十年在湖寮梅潭碓头的碑刻《奉县永禁陋弊碑记》记载:

切清远一河,上通赤石,下抵碓头,设埠发货,船户轮流装载,历古至今,从无越混。迩年以来,人繁土窄,互商撑船者众,计百有余只矣。^②

航行于清远河上以载商人货物为主的船只,竟达100余艘,可见当时河运相当繁忙和兴盛。而百侯一带滩多水急,尤其是乱石横亘,于河中行船相当不便。为此,船户便雇石匠凿开巨石,以便行船。相对湖寮延绵十多里的梅子碓而言,凿开百侯的大水碓要容易得多。而且凿开巨石,对于泄洪以减少水灾,亦不失为良策。但村中士绅却以保守全乡风水为由,于乾隆元年八月十八日,合乡耆绅在墟中集会,认为河中巨石,乃“通乡之灵气”所在,因而严禁船户开凿河中乱石。会后,于河边凿石竖立《通乡公禁碑》,碑文称:

为严禁凿水口以肃乡规事。窃维乡里水口,犹家宅之门户。百侯上至大水碓,下自滑滩,以至盐灌集处,石势盘踞,是为通乡之灵气。乃有无知船户,胆敢偷雇石匠,凿破盘石,已经通乡知觉,严责重罚。今通乡勒碑公禁:嗣后有明知故犯者,查出除送至官治外,仍会各姓绅耆会集墟市,严加责罚,决不宽宥;又,一河两岸有妇女浣衣挑水,向来会禁船户,不得赤身露体。今因日久,渐生怠玩,合行申禁。如有不遵,拿获必加重惩。特禁。^③

由此看来,士绅们的乡村观念至为深刻。但细加考察,士绅们于墟市中集会,实际上他们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风水,更重要的是墟市贸易。如果河流畅通无阻,则商贩就无须在百侯地方上下货物,而可能会直接至湖寮墟、或至梅子碓市交易,从而影响到百侯墟的商业贸易和百侯人的经济利益,这是有乡土观念的士绅所不愿意的。因此所谓严禁凿开水口名为保护百侯一乡风水,实为保护一乡经济利益。

(三) 风水故事

传统百侯人信奉“风水”,因而在村中流传着很多风水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与宗族发展与村落空间建构有关。

1、杨氏始祖四十一郎开基“铁炉坝”的风水传说

关于杨姓始祖四十一郎公开基百侯,有很多传说,其中有关风水的故事影响最大。民间传说,杨氏三兄弟从宁化石壁过大埔,老大四十一郎迁北塘,老二四十二郎迁百侯下村,老三四十三郎定居百侯南山。四十一郎是与百侯池姓始祖念三郎一起从石壁过来的,池念三郎一开始就迁居百侯村。^④四十一郎先到西河北塘阿隔口定居,娶妻余氏,生一子。后接受池姓人邀请,也来到百侯,在今称“铁炉坝”的地方起炉打铁。他见百侯比北塘更好,也想迁居百侯。但同妻子余氏商量时,余

① 蔺塙: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輿志·山川》,第34页。

② 蔺塙: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輿志·山川》,第34页。

③ 碑原在河边,现存放于侯南村中翰第。

④ 2003年8月11日,在侯南村对杨启新的访谈。杨启新,百侯侯南人,70多岁,退休教师,居于池屋旁荣新居。

氏不肯,而愿留居北塘。四十一郎只身迁居百侯,再娶沈氏六娘为妻,生子大一郎,传下百侯杨氏一脉,四十一郎因此“花栽两地”。后代为纪念先祖艰苦创业,称最早定居之地名为“铁炉坝”。^①

四十一郎之所以决定迁居百侯,相传是因为他相信百侯有好“风水”。有一年春节回北塘过年,年后回来时,发现炉火仍然很旺。炉火半月不熄,因而认为该地“龙气”很旺。同时走时所饲养的母鸡正在生蛋,此时已带着一窝小鸡四处觅食了。因此认为此地“风水”很好,决定迁居于此。^②

康熙六年杨士薰以杨氏四世祖杨德旺的名义建小宗祠,就是在始祖四十一郎最早定居的“铁炉坝”地方建起来的。

2、杨氏三世杨敬宗祖坟风水“倒钩金钩”的故事

相传风水师为杨氏看风水,认为所找的城前角三世祖杨敬宗的坟为好风水,并打赌:“牛生马崽,鸭生金蛋,三年后来取庚金。如果实现了,要一斗金,一斗银。”杨家人都不太相信,就答应了。第二天,有人来村里演马戏,有一匹马崽跑到牛栏里,被祖婆看到,真的“牛生马崽”。祖婆去鸭棚里捡鸭蛋时,戴在手上的金镯掉到地上,便捡起来,也应验了“鸭生金蛋”。因此风水师的二个赌都实现了。而风水师也在第三天就来了,要收庚金。而杨氏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不过他家的媳妇相当聪明,就在谷斗上放金耳环,在斗米上放银块。风水先生盛赞其机智,就收下了。^③

据杨氏族谱记载:“三世敬宗,公淳厚长者,创置上杨、下杨屋基,垂裕后昆。生卒失记,寿七十三,谥淳叟。娶蔡氏,谥慈善。合葬本村城前角石子坟,坐丁向癸兼未,形如‘倒地金钩’,左砂湾抱收水,面对壬尺案山,实为吾族发祥之地。生二子,曰德广、德旺,遂分两房。”^④由此可以明白,之所以认为这是好风水,是因为侯南杨屋的村落,是他开拓的;所有的杨姓人,都是他传下来的。

3、杨氏六世祖杨安“鬼子担银”的故事

关于杨氏的发家,在百侯一带一直流传着“鬼子担银”的传说。相传六世杨安出身贫穷,但很快就发家了,相传得到风水先生相助,将父杨克昌葬于高礞蔡子坑,“地形称为‘五鬼闹金狮’,即寅葬卯发之地也”^⑤。杨氏因得到笔意外之财后,便开始很快地发展起来:

相传杨克昌早逝,留下妻子温氏和3个儿子安、瑾、宣。温氏德性过人,为慰夫在天之灵,力图振兴杨家,对三子谆谆而训,善善而诱,言传身教。虽自己节衣缩食,但对更困难者慷慨大方,尤对乞丐多有接济。邻居富家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建坟,风水先生为找好风水,天天在周围山中寻觅,费时较长,花费不少,渐为主人怠慢,甚至恶言相向。风水先生气不过,在一天傍晚收拾行装准备夜间回家,这在当时猛兽横行的山区是相当危险的。在路过礞下克昌家茅房时,被温氏母子发现,便婉言相劝,并留宿于家中。他们将床铺让给风水先生,而母子睡在灶间。第二天为款待他,又将家中唯一生蛋的母鸡杀了。但在早餐时,风水先生所吃的都是鸡骨头和鸡杂,心想温氏也不过如此。上路后,他越想越感到不对劲。待到肚饿打开温氏所送的饭袋时,发现里面装的全是鸡肉。他为温氏的热情好客所感动,并非常后悔错怪了她,因而要报恩于她。当即返回杨家,将为邻居所看的好风水送给了温氏,为其夫克昌做风水,修坟莹。

葬后几个月,就有过客寄存货担于家。当时是晚上,看不清人面,不断有人挑担进门。温氏见门槛高,挑担人进门很辛苦,就在门槛前垫了一块石头,但此后就再没有人挑担进来了。本讲好3个月后来取,但半年也没来。杨氏兄弟打开货担,发现全是白银,杨安三兄弟因此发了财。这就是

① 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

② 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

③ 2003年10月21日,在侯南村对杨永和的访谈。

④ 杨绩绪:乾隆百侯《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2页。

⑤ 杨凤来房《历代祖考妣郎名逐普[族谱]》,手抄本。

广为流传的“鬼子担银”的故事。民间认为杨安为其父杨克昌所葬之风水“主富”，此银是鬼神所送。风水先生调头的地方，后来被称为“转水完”，意为风水先生打转（回）水来还恩于克昌婆温氏，以彰其行义之举。^①

这个故事在百侯甚至粤东一带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解释杨氏崛起的一个主要依据。^②当然，也跟杨安传下来的子孙众多有关。

4、杨氏六世杨安坟“五星归元”风水的传说

杨氏发家祖六世杨安死后，葬于本村中央的大坟顶。其风水名为“五星归垣”，即“合廓山嶂崇、南洋崇、西山崇、天保寨崇，四山凑成五行，其地称为‘五星归垣’。”^③

“五星归垣”是整个百侯盆地的中心点。至今民间还在传说，当年为点准“穴位”，特意派人到东边郭山嶂、西边西山崇、南边南阳崇、北边天保寨这4座高山的山顶上拉绳子，东西、南北两条绳子相交的中心点就是六世祖坟“穴位”所在地。^④因此认为该坟风水最好，社会评价也最高：“此地乃吾族中唯一之大名地，已绘图与（于）地理之书。”^⑤墓用花岗岩石条铺成，有石碑坊、石栏杆，面积达四五百平方米，是杨氏最大也是最豪华的坟墓。后来整个村落的发展，基本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展开。全村后来发展至“三十六条巷”，但巷巷都可通到这里。一直至20世纪50年代“移坟上山”时，杨安坟才被拆迁。至20世纪80年代，该地被建成戏院，成为全村的文化活动中心。^⑥

以上风水故事之所以广泛流传，是因为今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杨姓人，都是这几位祖先传下来的，每年都要组织大规模的祭祖活动，祈求这些祖先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当然希望祖先占有好风水，有“灵力”和能力。也因为这些活动，这些祖坟成为杨氏宗族在村落空间建构的重要标志。

5、隔河斗风水：“猛虎捕羊”与“观音挡虎”的故事

肖杨两姓虽然世代通婚，但共处一区，互相竞争。除了偶而发生械斗外，表现更多的是争夺象征性资源，如“风水”竞争等。

关于风水竞争，各姓之间乃至各房之间，都曾发生过许多故事。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双方互用风水手段“制”对方，以直观的思维方式战胜对手。百侯有句反映南北关系的俗语，“侯北有‘虎’形，侯南有‘狮’形；侯北有鸳鸯祠，侯南有观音亭。”两者隔河而立，遥遥相对。这一俗语，源自肖、杨两姓之间的一次风水争斗故事。

雍正五年，侯北肖俊章房派改建正直公祠，风水名为“猛虎捕羊”，成为肖氏宗族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百侯社会尤其是肖、杨两个大姓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康熙二十四年由富绅肖元溥与弟元涓将其六世祖肖廷钦之故居改建成正直公祠，当时颇受好评。但至雍正初年，得到相当发展的肖氏宗族，对其不能满足新的愿望而有所怨言：

堪輿家多言此祠以形势论之，百侯一乡，无出其右者。现传丁、财之盛，甲一乡。文人济济，亦差相埒。而未有登科第者，以立向之非宜，制作之未善故也。盖谓其自禾仓崇起，少祖出胎，属艮龙右转。水则左旋，倒右而朝山，近案及堂局，俱在丙，是丙向为宜，而误向巳。又以祠式稍卑隘，

① 杨永城：《百侯杨氏源流小考》，《大埔文史》第16期，1998，第243-248页。

②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0，《人物·方技》，第20页。

③ 侯南杨风来房：《历代祖考妣郎名逐（族）谱（谱）》，不分页。杨思海1970年抄本。

④ 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添顺、杨永汉的访谈。杨添顺，70多岁，退休干部。其父曾任观音亭庙祝，小时随父在庙中，听闻乡中故事颇多。

⑤ 侯南杨风来房《历代祖考妣郎名逐（族）谱（谱）》，不分页。杨思海1970年抄本。

⑥ 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杨永汉的访谈。

寝座之间不见秀峰也,议改者屡矣。^①

虽然自认为在好风水保佑下,实现了财丁兴旺,但感到因坐向不善,影响了科举功名的取得。表明当时因对科举功名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焦急和自责心情。

重建六世正直公虎形祠,是由其宽四子凤翔自认为看上“好风水师”后,于雍正五年进行的。“岁丁未(雍正五年),适丰城金鱼黄先生至,论与余合。”^②便集合五房族众,由殷实商人肖无欺任总理,由风水师主持,“期不数月而祠成,巍然改观。计所费千有余金,悉出自变卖祭田。”^③后来无欺捐出父尝银100余两,其宽二子永章之子允中捐280多两,剑南之子捐140两,将被典祭田70石赎回,使祀产仍保持完整,并存银增置。

建造该祠,肖氏可谓“大动干戈”,除了典买尝产谋取经费外,为建祠而形成的文书《送屋基换作通沟送帖》、《换地作通沟协议》、《重建六世祖正直公祠秩祐堂祭栋楹文》等,都保存于族谱中,可见族中士绅对此事相当重视。

该祠重建于侯北虎形山下,所背依的山形酷似一只“老虎”,因而被风水先生形象地认定是一只正要下山的“老虎”,威猛无比。祠堂刚好建在“老虎”的嘴巴上,因而该祠的风水叫“猛虎捕羊”。而河对面所居者恰以杨姓为主,因而这一风水明显具有针对性。出面聘请风水师和主持重修者均为士绅家庭,而且与杨氏世代通婚。将祖祠风水名为“猛虎捕羊”,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雍正五年,侯南杨氏有进士杨之徐,翰林杨纘绪,举人杨润时、杨辉玉、杨纘绪、杨绪英、杨树敏、杨时宪、杨景灏、杨允玺,而且多为同科中举,名声大震。而原在科举方面居于先导并一直领先的肖氏,自雍正三年翰林肖宸捷死后,连举人也没有一个,与杨氏的方兴未艾相比较,肖氏明显处于下风,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为了挽回颓势,肖氏希望通过用风水的策略打败对方,振兴肖氏,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而有重建正直公祠之举。

在重建过程中,肖氏改变祠堂的朝向,以后山虎形山为“虎身”,以中村后的篁竹宫为“虎尾”,而将祠堂门楼建成“虎头”,张挂两个大灯笼似“眼睛”,作“猛虎起跳”状,名为“猛虎捕羊”。虎要吃羊,而侯南恰以杨姓为主,因而认为可以在与杨姓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④

相传正直公祠风水建好后不久即“显灵”了。肖其宽之孙、凤翔之子大中于雍正七年考中了举人,成为正直公房考中乡科的第一人。“越二年己酉(雍正七年1729)乡试,大中遂得叨中式十六名焉。”^⑤但这一年侯南的杨成梧、杨煌也同时考中举人,肖氏还是敌不过杨氏。

针对肖氏的“猛虎捕羊”,杨氏也采取的相对应的措施,在河边建造观音亭,名为“观音挡虎”。

杨姓与肖姓为当地大姓,且人丁、科名旗鼓相当。“一山难容二虎”,当时肖、杨相斗,时人称“虎打虎”。杨姓人多,且科名鼎盛,因而居于优势。但自肖姓改建“虎形”祠后,相传杨姓总“损丁”,感到很不顺。因此杨氏“老成”^⑥商量,肖姓以“猛虎捕羊”“制”我们,我们也要“制”他们,而要“制”就要在相对的河边。于是请风水师来察看,见有一庐姓人的房子正对“虎形”,因此将庐姓人迁居侯西地方,在此建成了“狮形”。又从村口茶亭下观音庙分香于此,设观音神牌,名为“观音行宫”,又名“观音亭”。又于亭下建成洗衣码头,让村人天天在此洗衣,以捶衣之声赶“虎”,使“老虎”不敢下山。后来庐公庐婆没有传下后人,就在观音亭中设其神位,使他们世享侯南人的烟火。^⑦

① 陈侠:乾隆四年《重建正直公祠堂记》,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92页。

② 肖凤翔:《正直公尝祀序》,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84-85页。

③ 肖俊章:《正直公尝祀序》,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85-86页。

④ 2003年8月13日,在侯北中村对肖清耀、肖延麟的访谈。

⑤ 陈侠:《重建正直公祠堂记》(乾隆四年),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92页。

⑥ 老成,当地俗语,指在族中有身份、地位且年龄大、社会阅历丰富之人。

⑦ 2005年11月19日,在侯南村对杨添顺的访谈。

报告人称:观音亭里没有观音“金身”,只有刻着观音神位的“金牌”。观音亭的所谓“狮形”,是以整栋坐南朝北的亭子作“狮头”,前面两边各挂一个大灯笼象征“眼睛”,中间挂两排小灯笼象征“牙齿”,以供奉的神牌作“舌头”。亭子下面砌一个“狮铃”,两条上亭的路砌成叉在一起,为两条“前腿”,亭旁的继志堂、更兴堂等房屋为“后腿”,中间的房屋为“狮身”,大榕树下地方的大榕树为竖起的“尾巴”。整个形象如同一只“睡狮”,对着对面侯北的“虎”形,整个建筑风水名为“观音挡虎”。^①

杨姓以“狮”形对“虎”形,以观音堂对肖姓祠堂,从而以直观的思维方式,在心理上赢得对抗。杨姓人甚至传说,帮侯南的风水师,也正是为肖姓建“虎”形祠的风水师。相传在建虎形祠时,肖姓人得罪了地理先生,他就跑到侯南来,帮杨姓人建了“狮”形,有利于杨姓。因而在道义也赢了侯北肖姓。^② 这些传说,当然是一面之辞,但反映了两姓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

每当元宵节的灯会,侯北肖姓将正直公祠装饰得金碧辉煌,灯火通明,“猛虎捕羊”,显得“跃跃欲试”。而侯南的杨姓则把观音亭装扮一新,“睡狮”变成了“醒狮”。双方便以虎形祠、鸳鸯祠和观音亭为中心,隔河赛灯,热闹非凡,成为乡中不可或缺的传统。

两个大姓隔河相斗的风水故事,反映在争夺社会资源过程中,两姓之间既通婚又争斗的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构成了乡村社会关系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而观音亭与鸳鸯祠、“狮形”与“虎形”的隔河相对,成为两姓关系的重要标签。

五、结语

在建构百侯村落空间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宗族、墟市、庙宇、民间信仰等是重要因素。村民以姓氏为单位,以开基祖作为始祖,以始祖作为依据,通过建宗祠、修族谱、设尝产、定族规、分房份等活动,设立各种各样的宗族标签,并以崇拜祖先的方式定期组织仪式活动,从而建构起等而有序、组织严密的宗族社会组织,构成乡村社会空间结构的主体性因素。

“侯南杨姓人吃街场,池姓人吃鱼塘,侯北肖姓人吃田洋”的民间俗语,直观地表达了村民职业的空间分布。村民将墟市置于村落的中心地方,根据市场的需要安排生产活动。开发山林、种植烟草、开办烟厂等经济活动,都是因地制宜根据市场需求而形成的产业,形成村民的经济活动空间结构。

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定居历史的村落,经过长期“层累”,村民的民间信仰相当复杂。既有原始的石头、土地崇拜,也有外来的佛教、道教信仰,还有祖先神等。村民们在村落的四周设立所谓“四大宫”、“四大寺”等,建构起完备的民间神明系统,尤其重视村落水口的营造,并定期举行隆重的仪式进行“集福”活动。为了表示得到“好运”,村民风水崇拜观念相当强烈,并形成很多风水灵验的传说。神明的背后是人,不同的神明背后是不同的人群。通过这些庙宇和仪式活动,建构起村落鲜明的村落空间分布和空间范围。

(校对:周云水)

^① 2005年11月22日,在侯南村对杨德球的访谈。

^② 2005年11月23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